

### 第三章 從明治到昭和： 日本知識分子眼中的他者「台灣」

(台灣)既歸我版圖，則不容將此天惠地福仍如原  
樣地付諸蠻民之手。大量移往內地人以開發其富源  
，即為文明之本意。

—— 福澤諭吉，〈台灣永遠之方針〉

日本著名史家信夫清三郎曾謂，1868 年的明治維新在「意識形態」上有 2 個課題，一為創立「日本」，二為形成「日本人」，他認為創立「日本」是民族革命的課題，即建立與萬國對峙的中央集權「國家」；形成「日本人」則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課題，即為了動員人民的創造性和全體意見支持這個國家，從而實行形成「國民意識」的意識改革。<sup>1</sup>而對於「日本」或「日本人」這種集體意識的創立，無疑地，在面向新世界的「文明開化」發展進程，日本史上的明治時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轉戾點，身處這個時代的啓蒙者、知識分子常肩負著承上啓下的輪軸，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但建構了自己的優越意識，也以此作為對週遭被殖民「他者」的評判標準。只是，倘若依據帝國主義國家殖民史的發展歷程來看，這種角色所造成的結果卻並非全然是正面的，有時也導引國家陷入悲情的宿命情境，例如薩依德在探討「集體的必要性」與「知識分子聯盟」的問題之間互動時，便認為歷史上沒有一個像近代日本那樣問題叢生且混淆不清，以致釀成悲劇的案例，他甚至認為 1868 年明治維新的王政復古、廢除封建，開始建立了一個「新綜合的意識形態」(composite ideology)，最後卻導致法西斯式的軍國主義

---

<sup>1</sup> 信夫清三郎著，呂萬和等譯，日本近代政治史：第 3 卷 - 天皇制的建立（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4 年），序 1。

與民族的浩劫，埋下了 1945 年日本殖民帝國敗亡的因子，與此同時，它也貶抑其他種族，如在 1930 年代藉「指導民族」（即日本人是領導的民族）之名，任意屠殺中國人。<sup>2</sup>此外，有趣的是，美國的日本歷史學家顧拉克也主張，明治時期知識分子「創造」了「尊王意識形態」（*emperor ideology*），認為它原先是孕育於「與萬國對峙」的自衛甚至自卑感的心態，但是到了 1915 年已成爲羽翼豐厚的民族主義，能夠同時從事極端的軍國主義、崇敬天皇，以及本土主義，並將個人置於國家之下。<sup>3</sup>只是，無論是薩依德所謂「新綜合的意識形態」，或是顧拉克的「尊王意識形態」，並非是新奇的產物，而其實質內涵正是傳統東方儒家「華夷思想」的衍生物——「尊王攘夷」思維。

明治時期，面對內有封建制度的壓迫與腐朽，外有列強的環伺欺凌，身爲幕府時期舊儒家知識階層的武士，所感受「國家」的獨立遭到嚴重威脅程度，通常要比其他階層人士深刻的多，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也認為將日本從封建時代變成統一時代的改革，並非來自大多數的農民或工商業者的思想行動，而完全是由幕府後期的「武士」這一階層發動出來之事業，他們面對外國人跋扈，幕府的一味退讓，心中恨意湧現，便打著「尊王攘夷」的旗號去反對幕府、推動維新，因而在近代日本改革中成爲國家政治的中堅力量，甚至他們很多人放下身分，滲入原本爲人不齒的商賈階層，並且在日後成爲影響日本政治走向的財閥，<sup>4</sup>因此明治時期的帝國行政官僚、啓蒙家、殖民政策學者等知識分子，出身於武士世家的並不少，除了許多的台灣總督不論外，這些代表人物還包括作爲「文明開化」啓蒙導師的福澤諭吉，以及首批的殖民地行政官僚後藤新平、新渡戶稻造等人；此外，新一代的殖民政策學者泉哲、細川嘉六、矢內原忠雄等，以及文學、小說家佐藤春夫、庄司總一、西川滿、濱田隼雄等人，都可以從這些人物的視野中，拼湊出對「他者」台灣的想像與認知。

## 第一節 日本歷任總督的「台灣論」

從 1895 年到 1945 年的半個世紀當中，日本殖民帝國共派任了 19 個台灣總督，渠等總督雖均爲一時之選，惟任期卻稱差不齊，最長者超過 9 年，最短者實

<sup>2</sup> Edward W. Said, "Holding Nations and Traditions at Bay,"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pp.41-42.

<sup>3</sup> Carol Gluck, "The Late Meiji Period,"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7-21.

<sup>4</sup> 戴季陶，*日本論*（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年），頁 45-58。

際不到 2 個月，平均則僅在位 2 年半，可以說更迭相當頻繁。一般對於台灣總督的分期，主要可以分為 3 期，即：「前期武官總督時期」、「中期文官總督時期」，以及「後期武官總督時期」。實際上，無論是前期以薩摩藩（鹿兒島）、長州藩（山口縣）為主的武官總督、大正及昭和初期來台的文官總督，或是後期日本軍國內閣所再度派任的武官總督，一般而言，台灣總督是集行政權、立法權與軍事權為一身的絕對權力者，並且透過總督府的官署系統，幾乎掌控所有行政資源，此外，尚可隨意任命、左右法官、檢察官及鎮壓島內反對力量，可以說是十足的「台灣皇帝」。<sup>5</sup>渠等上任後大部分都會行禮如儀般地公佈所謂的「施政方針」，而這樣的「施政方針」則可視為官樣的「台灣論」。

## 一、前期武官總督時期

從首任總督樺山資紀，至第 7 任總督明石元二郎，為前期武官總督時期，共計 23 餘年。本期因初據台灣，百廢待舉，且抗日義軍此起彼落，加上對台灣風俗習慣不熟悉，需要加以安撫住民，故本期又被稱為「綏撫時期」，政策上採寬猛並濟，目標則在建立台灣為日本帝國的「模範殖民地」。前期武官總督及其施政方針，<sup>6</sup>如表 3-1。

表 3-1 前期武官總督及其施政方針

任	總督 (軍階) 生卒年	出生地	到任時間	施政方針
1	樺山資紀 (海軍大將) 1837-1922	鹿兒島	1895/05/10 - 1896/06/02	台灣為帝國之新版圖，乃未浴我皇化之地。加之有割劇東部之蒙昧頑愚之番族，故今後臨斯土著，須以愛育撫為旨，使悅歸於我皇覆載之仁，而亦須恩威並行，使所在人民，不生狎侮之心。據最近清國政府公報，台民對於割地，表示激憤，舞弄干戈，……一時或難保其不須用兵力以鎮壓不逞之徒也。

<sup>5</sup> 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 年），頁 112。

<sup>6</sup> 歷任台灣總督及其施政方針，參見井出季和太著，郭輝編譯，*日據下之台政*（原名：台灣治績志）（全三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3 年）；司馬嘯青，*台灣日本總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5 年）；鷺巢敦哉，*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台北：台灣警察協會，1941 年），頁 168；以及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台灣民報社論*（台北：稻香出版社，1992 年），頁 339。以下同。

2	桂太郎 (陸軍中將) 1847-1913	山口	1896/06/02 - 1896/10/14	地方行政在施政上，一面予以指導教育使服皇化；一面刑罰嚴明，以示威信人。……是以欲達成地方行政之目的，則地方官員應以警察與兵備為羽翼，寬猛得其中庸。……在地人民之教育，不可一日忽視之，應使學習日語，主動養成日本之觀念，自不庸論。
3	乃木希典 (陸軍中將) 1849-1912	山口	1896/10/14 - 1898/02/26	政治之要諦，在乎寬嚴適度，恩威並行，使人民畏其威而服其德，在台灣施政上尤其為然。……蓋聞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顧當兵馬倥傯之間，雖往往難免此弊；倘若漫無底止，則怨恨漸結，民心日形乖離，將見妨礙施政至甚也。
4	兒玉源太郎 (陸軍中將) 1852-1906	山口	1898/02/26 - 1906/04/11	至今在收攬民心一項，尚有不能不遜於中國式之政治者，其故何在？曰：對此粗野而幼稚之人民設以構成複雜之官銜，而政令動輒紛歧不一，反不如中國官銜之單純，而政出一門也。……教育一日不能忽視，然而徒為灌注文明，養成偏向主張權利義務之風，將致使新附之民，陷入不測之弊害。
5	佐久間左馬太 (陸軍大將) 1844-1915	山口	1906/04/11 - 1915/05/01	僅簡單說明不變更前任總督的施政方針，以及努力安民等事宜。
6	安東貞美 (陸軍大將) 1853-1932	長野	1915/05/01 - 1918/06/06	對振肅官紀事宜進行訓示，並謂「日語之推行，習俗之改良，台灣統治之根柢……台灣乃天惠之地，利源堪用者殊多，自不待言」。
7	明石元二郎 (陸軍中將) 1864-1919	福岡	1918/06/06 - 1919/10/26	謂「殖民地統治方針，本來常有變更，此乃視其時代情形而定。然而根本政策，自須依據基礎確立之軌道，不容變動。欲造成與日本本國無異之領土，端賴諸君努力，倘不能達成此根本目的，則可證明日本雖擴大土地，亦缺乏統治能力。……世界各國殖民地對各該國作犧牲貢獻，鑒於此點，台灣對我國之軍需、經濟方面之貢獻，需要諸君努力，以求其實現」；又針對台灣同化方針為施政重點，謂「夫台灣施政，在乎感化島民，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是為本總督統治之目標。……台灣當交通要衝，土地膏腴，鑄山煮海，富藏不少。……日台人士應互相和協，共興台灣文物，使台民與我同心，是為主要統治目的。由於風俗言語之相異，所生之障礙，須予打破，以期到達融和結合之順境云」。

## 二、中期文官總督時期

從第 8 任總督田健治郎，至第 16 任總督太田政弘，為中期文官總督時期，共計 12 餘年。本期由於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主思潮與民族自決呼聲瀰漫全球，台灣住民亦隨著教育普及及社會變遷而逐漸崛起，更表現在以新的政治、社會及文化上的「體制」內抗爭，取代昔日的武裝抗日運動方面。而為籠絡台人，謀求統治順利，從第 7 任明石總督起即以同化方針為施政重點，繼任者第 8 任、也是首任文官的田總督於上任前更已堅抱「同化政策」，上任後以「同化政策」、「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來作為重要的施政方針自不待言，故本期又被稱為「同化政策或內地延長主義時期」。中期文官總督及其施政方針，如表 3-2。

表 3-2 中期文官總督及其施政方針

任	總督 (政黨) 生卒年	出生地	到任時間	施政方針
8	田健治郎 (政友會) 1855-1930	兵庫	1919/10/29 - 1923/09/02	夫台灣，構成日本之一部領土，雖然屬日本帝國憲法統治之版圖，不能視同英法各國之以殖民地只為其本國政治之策源地，或經濟上利源地而論。因此，統治方針，皆以此大精神為前提，作種種經營設施，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必先致力推行教育，一面啟發其知能、德操，一面使知我朝廷撫民精神與一視同仁之聖旨，而予醇化融洽。與內地人在社會上接觸無任何逕庭，結局須為教化善導，使其到達政治上均等地步。……台灣由來富有天惠資源，在領台後 20 餘年間，生產力之伸展頗為快速，已有面目一新之概。
9	內田嘉吉 (政友會) 1866-1933	東京	1923/09/06 - 1924/09/01	台灣統治方針，夙已確立，…歷代總督皆據此善為設施，…以謀文化之發達。台灣產業之發達，已示最顯著之成績。…雖有豐富之天惠，而學理與技術，尚需加以研鑽。……台灣位於南北交通之要衝，對於華南、南洋，經濟關係頗為密切。處在此間敦促善鄰之誼，同時互相增進商業上之利益，信為我台灣唯一之天職。
10	伊澤多喜男 (憲政會)	長野	1924/09/01 - 1926/07/16	未曾正式發表施政方針，惟曾於地方長官會議上聲稱：「我的台灣統治策，是要以內台人共

	1869-1949			存共榮為方針，是要以 380 萬住民為對象，是要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又要聽於無聲，見於無形」，並無任何新穎之見地。
11	上山滿之進 (憲政會) 1869-1938	山口	1926/07/16 - 1928/06/16	強調台灣在日本殖民地地位之重要性，倡導日台民眾感情之融和，並勗勉部屬涵養德操，以清廉、誠實、勤勉三項自愛。
12	川村竹治 (政友會) 1871-1955	秋田	1928/06/16 - 1929/07/30	歐戰之經驗，一面促進各國國民之覺悟，…而一面，則思想呈現動搖之傾向，動輒有將出諸國利民福所不容之行動者，殊屬憾事。故當振興文教，培養健全之國民精神，與淳良之風氣，同時洞察人心之機微，嚴加戒慎，苟發見與統治方針相反之跡象，當即斷行處置，毫不寬貸。……台灣天惠甚豐，資源頗富，歷代總督致力產業政策，其進步大有可觀，然而尚未開發之富源尚多，事業方法，大有改進餘地。就台灣對日本所負之經濟使命言之，其對華南、南洋之地理關係，有待經營者頗多。
13	石塚英藏 (民政黨) 1866-1942	福島	1929/07/30 - 1931/01/16	無任何新穎之見地。
14	太田政弘 (民政黨) 1870-1951	山形	1931/01/16 - 1932/03/02	大致以人民之融洽為基礎，振興文教，發展產物，以推行其殖民政策。勉勵官員廉潔自愛，勿致有失政府威信。
15	南弘 (政友會) 1869-1946	富山	1932/03/02 - 1932/05/26	在職不過 3 個月，無治績可言。
16	中川健藏 (民政黨) 1875-1944	新潟	1932/05/27 - 1936/09/02	謂「日本自領台以來，統治方針早已確立，即以全台民眾打成一片，促進健全之發達，台灣乃日本領土之一部，人為日本國民，日本之治台，實與列強之殖民政策不同，望官民咸體會此意。……台灣正當南北交會之要衝，獨占地利，而富於天惠之資源。誠宜加以開發利用」，又針對台灣自治問題述其抱負「台灣統治方針，在乎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此乃日本領台以來，不曾改變，而歷代總督亦皆致力促其實現。然而一般日人似未必一致贊同，或謂民族互異，性格不同，不該採取與日本內地同一政策。而部分人士則加以非難，謂：如果予以差別設施，則所謂一視同仁，不過美辭麗句。至於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在學者政治家，亦以之為殖民政策之定理，彼等僅謂：自治主義可致殖民政策之經營成功；而同化主義之殖民地經營，終當失敗，此乃歷史所證明者云云。依此論據以非難台灣統治方針者，在今日之台日人士尚屬不少？本人則大不為然。本人以為…殖民地之統治，治人與治於

				人兩民族相對立，易於互相猜疑，是以為…昭示威信於民眾最為要緊」。
--	--	--	--	----------------------------------

### 三、後期武官總督時期

從第 17 任總督小林躋造，至第 19 任末代總督安藤利吉，為後期武官總督時期，約計 9 年。本期因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國力耗損過鉅，極需台灣、朝鮮、滿洲等各日本殖民地的住民全面協助，因而加緊言論統制，強迫各地住民在生活方式上放棄固有傳統，改採更激進的同化政策——「皇民化」運動，以期確立積極的「戰時體制」，故本期又被稱為「皇民化時期」。後期武官總督及其施政方針，如表 3-3。

表 3-3 後期武官總督及其施政方針

任	總督 (軍階) 生卒年	出生地	到任時間	施政方針
17	小林躋造 (預備役海軍大將) 1877-1962	廣島	1936/09/02 - 1940/11	標榜以「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作為施政的三大基本方針，並指出：「從一開始，為了顯示國體的意義，闡明人民的決心，接受並實行『在他公平注視下』的帝國願望，進而產生同化的事實，這一直是日本統治台灣堅定且不變的政策。鑒於帝國的使命，台灣的地位以及當前的世界局勢，最緊急的任務是讓五百萬島民獲得與日本人同樣的資格，以恢復他們的決心，共同為國家的繁榮奮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透過提升大眾教育，矯正語言風俗，並培養忠誠帝國子民的基礎，以便為帝國精神的推廣貫徹而奮鬥」；又總結其施政目標，在於「高度國防國家之一環的台灣之新建設」。
18	長谷川清 (海軍大將) 1883-1970	福井	1940/11/27 - 1944/12	持續推動皇民化運動，表明內地人、本島人、高砂族一體化，「台灣一家」。
19	安藤利吉 (陸軍大將) 1884-1946	宮城	1944/12/30 - 1945/10	已近戰爭末期，持續推動皇民化運動，無任何新穎之見地。任內簽字受降，結束日本在台長達 51 年的殖民統治。

綜上所述，無論是武官總督或文官總督所公佈的「施政方針」，內容總不脫「聲言重視台灣之地位」、「倡言日台民眾之和洽」、「增進南方商業之利益」、「勉勵官僚廉潔自愛」，以及「勿致有失政府威信」等，其目的當然以有利殖民者的殖民統治、向列強誇耀統治能力等為前提考量，因此，在此等考量之下，什麼「一視同仁」、「全台一家」、「相互和諧」、「收攬人心」等，都只是欺騙台灣住民的華麗詞藻、官樣的八股文章，證諸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歷史發展脈絡來看，即便是文官總督的統治方式，較之武官總督亦毫不見手軟，<sup>7</sup>而一份完全屬於台灣住民的雜誌《台灣》，對此更一針見血地直斥為「武官專制」與「文官獨裁」了。<sup>8</sup>此外，台灣總督的「施政方針」雖多為官樣的「台灣論」，惟值得注意的是，從中所顯露殖民者只求對被殖民者採取強制、機械性的「同化」、「皇民化」政策，倒是成為真正的施政重點，且其精神亦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相對的，只要是任何增進被殖民者民主自決意識的訴求，甚至只是提倡被殖民者的「普及教育」權利，則遭到殖民者視為毒蛇猛獸般地打壓，在此施政之下，台灣住民也只能淪為二等公民，永遠也無出頭之日。

## 第二節 日本殖民論者的「台灣論」

日本自明治時期以來，除先前於 1869 年 7 月完成對北海道蝦夷地合併、1879 年藉「廢藩置縣」強行處分琉球之外，尚陸續取得台灣、南庫頁島、朝鮮等重要殖民地（日本領土及殖民地、獲得方式及年代，如表 3-4），致使日本帝國殖民及殖產事業蓬勃發展，並連帶引起知識分子對殖民統治政策的各種討論研究、論述著作興盛，一時之間，有關「殖民學」、「殖民學史」堪稱蔚為日本學術圈中的「顯學」。此外，由於時代潮流的波瀾影響，各種政治思潮、學說興起，也對各殖民論者有關之殖民統治政策的研究與擇定，造成了深遠影響（本章有關的日本殖民論者政治傾向、著作篇章、發表時間及地點，如表 3-5）。

表 3-4 日本領土及殖民地、獲得方式及年代

領土及殖民地	獲得的方式及年代	土地面積（平方公里）
--------	----------	------------

<sup>7</sup> 司馬嘯青，前引書，頁 225。

<sup>8</sup> 「官權與民意」，《台灣》，第 4 卷第 2 號（大正 12 年 2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55。



日本本國		382,561
台灣	中日甲午戰爭，1895 年	35,961
南庫頁島	日俄戰爭，1905 年	36,090
廣東租界地	日俄戰爭，1905 年	3,462
朝鮮	併吞，1910 年	220,788
太平洋託管島嶼	一次世界大戰後，自戰敗國 德國手中取得，1919 年	2,149

表 3-5 本章有關的日本殖民論者政治傾向、著作篇章、發表時間及地點

姓 名	生卒年	政治光譜傾向	著 作 篇 章	發 表 時 間	發 表 刊 物
福澤諭吉	1934-1901	國家主義	《勸學篇》、《文明論概論》、〈脫亞論〉、〈指令割讓台灣的理由〉、〈台灣永遠的方針〉、〈進取的方針〉	1872-1895	日本《時事新報》
後藤新平	1857-1929	保守主義	《國家衛生原理》、〈台灣統治急救案〉、〈日本殖民政策一斑〉	1889-1921	日本拓殖新報社
新渡戶稻造	1862-1933	中間溫和	《武士道》、〈日本國民〉	1899-1903	
矢內原忠雄	1893-1961	自由主義	《殖民及殖民政策》、《日本帝國主義之下的台灣》、〈軍事的與同化的：日法殖民政策比較的一論〉、〈朝鮮統治的方針〉	1926-1929	日本有斐閣、岩波書店
泉哲	1873-1943	自由主義	《殖民地統治論》、〈台灣統治政策變更的必要〉、〈促進台灣統治政策的根本變革〉、〈評析台灣自治制〉、〈台灣的將來〉等	1919-1924	日本有斐閣、《東洋時報》、《太陽》雜誌等
細川嘉六	1888-1962	共產主義	《殖民史》	1941	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

## 一、福澤諭吉的「台灣論」

福澤諭吉於 1834 年出生在德川末期中津藩貧窮的下級武士家庭，其學習過

程歷經了漢學、(荷)蘭學轉而英學，加上早年遊歷歐美各國，受到近代科學與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很深。返國之後，極力介紹西方國家的狀況，傳播自由平等之說、提倡民權思想、促進「文明開化」，並鼓勵日本人學習科學、興辦企業，發揚獨立自主的精神，以爭取日本民族的獨立。只是福澤這種「文明開化」的旨意，是與侵略中國、併吞台灣、朝鮮、滿洲，連接西洋密切聯繫起來，充滿了以軍國主義為內涵的日本式「東方主義」色彩。

福澤一生著譯甚多，除了代表性著作《勸學篇》(1872年)和《文明論概論》(1875年)外，與中國、台灣有關聯者尚有刊載於《時事新報》上的〈攻台論〉(1884年)、〈脫亞論〉(1885年)等40多篇文章，而這些文本、著作的構成，從內容檢視來說都是環環相扣，也體現出一個殖民主義者、軍國主義者的侵略視野。福澤雖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熟讀中國古籍的《論語》、《孟子》、《詩經》、《書經》、《左傳》、《戰國策》及各朝代史籍等，卻也高舉完全否定、反對漢學、漢醫教育的大旗，認為研習漢學將阻止日本進入「文明之國」的行列。<sup>9</sup>在《文明論概論》中，福澤開宗明義將「文明論」視為是探討「人類精神發展的理論」，其目的不在討論個人的精神發展，而是廣大群眾的總的精神發展，因此亦將之稱為「群眾精神發展論」，同時也將「文明」分為兩個方面，即外在、易取的「物質文明」與內在、難求的「精神文明」。<sup>10</sup>這裡的「群眾」當是指日本人民，而福澤所意欲探討日本人民的「自我」精神發展，主要是藉由如何認識、理解「黑船來航」事件後所帶來「西方文明」，<sup>11</sup>甚至是古老東方「中國文明」的這些「他者」為前提條件而來開展的。此外，本書還充斥著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歷史認識方式，使得「弱肉強食」在這種認識論的基礎上得到了強化，<sup>12</sup>福澤並且還將「文明」劃分為「混沌期」、「野蠻期」、「未開化期」、「文化開明」期等4個階段，將日本等同於中國、土耳其等亞洲國家劃分為「半開化期」的國家，而其文明的取決標準即是「人的智與德的進步」，<sup>13</sup>然而此種標準過於主觀，因為其優勝劣敗可以任由強權者的意識單方面判定，也因此他對中國、朝鮮，以及後來強奪豪取過來的殖民地台灣之認識，除了經濟與軍事價值外，其他價值都被排斥於他的

<sup>9</sup> 福澤諭吉著，楊永良譯，**福澤諭吉自傳：一個影響日本近代化至鉅的頑童**（台北：商周出版公司，2005年），頁19-20、245-246。

<sup>10</sup>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文明論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頁1、10。

<sup>11</sup> 1853年（嘉永6年）7月，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將軍，率領四艘軍艦開到日本江戶灣口以武力威脅幕府開國，由於這些軍艦船身都是塗上黑色的，所以日本人把這次事件稱為「黑船來航」；1854年（嘉永7年）2月培理再次率領艦隊來到日本，面對培理的強硬姿勢，幕府只好接受開國的要求了。

<sup>12</sup> 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頁27。

<sup>13</sup> 福澤諭吉著，北京編譯社譯，前引書，頁9-10及第三章以下。

認識視野之外，甚至極盡詆毀之能事，也就不足為奇了；在〈脫亞論〉中，他深深地以日本地處中國、朝鮮的近鄰為恥，而認為日本的上策就是「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sup>14</sup>而福澤這種思維下的「中國文明論」與「日本文明論」之論述方式，顯有逐步崩解傳統東亞地區的指導思想——中國型的華夷秩序體系觀，並企圖初步炮製出新的指導思想——日本型的華夷秩序體系觀之意圖。

此外，福澤之前知識分子的「日本及日本人論」、「中國論」、「侵華論述」，因為多屬個人的言論，且未經充分的社會化，故對當時社會乃至政府的決策影響有限，但是到了福澤時則大有不同，因其論述是結合著資本主義、印刷科技的逐漸發達，依附在其於 1882 年主辦且發行量大的報紙《時事新報》上，因而對一般國民的思想、政府的決策，產生的影響相當深遠。<sup>15</sup>福澤關於殖民地台灣的經營思想，也散見於明治 27 年至 28 年，即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期間（1894 年至 1895 年）的《時事新報》上，這些文章包括了〈指令割讓台灣的理由〉、〈台灣割讓的利益〉、〈台灣的處分法〉、〈台灣永遠的方針〉、〈進取的方針〉等 10 餘篇。<sup>16</sup>

在〈指令割讓台灣的理由〉文中，他明言要求割讓台灣的理由，就如同割讓遼東半島一樣，是基於作為「一種邊境警戒的正當防禦」，以防止中國侵犯到日本帝國的「邊境」——朝鮮與琉球等地，而日本帝國也就是以受到「威脅」的這種自我意識，來合理化不斷遂行其擴張行為的藉口；在〈進取的方針〉文，則著眼於「全球擴張商業貿易」，進而對新附領地的台灣設定「進取線」。儘管福澤希望在台灣創造另一個「日本國」，但他卻是將台灣的「土地」與「人民」區別看待，他主張在具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台灣土地上的「日本國」人民，必須由日本所移民來的「文明人」來開發，至於原台灣住民的這些「蒙昧蠻民」般的「他者」，是不可能，也不會對日本在台灣的殖產事業有何助益，甚至他曾說：「台灣若為全無住民之無人島，對我而言，則為無上之幸運，其事情亦將甚順利……當局者

<sup>14</sup>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 10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1 年），頁 238-240。

<sup>15</sup> 安德森認為，要「想像民族」構成的先決條件，就是「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重合」，參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民族意識的起源」，*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年），頁 51。另有關於福澤諭吉的侵華思想，參見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 年），頁 41-42。

<sup>16</sup> 以下有關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發表台灣殖民地經營思想的譯稿與相關分析，主要參見吳密察，「福澤諭吉的台灣論」，*台灣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2001 年），頁 69-98。

所見之島地事務，即應只在其土地，斷不該將彼等島民置於眼中」、「彼土地事實上雖為日本之版圖，但其住民則全同於外國人，決不可認其為本國人。彼等數百年來居於外國政府治下，其心必自認被敵國所征服。而且，其風俗習慣，甚至思想信仰，實即外國人。因此，必須覺悟治之即如臨外國人」。另外，福澤也認為實際上「(台灣)豪族安住(中國)本土，地主權利依然在其手中，自本國移住之日本人民，恰淪於佃農之境界，呈主客顛倒之奇觀」，因此他對日本領有台灣殖民地，卻空有台灣「人民」而沒有「土地」的這種「未蒙其利(土地地利)、先受其害(人民抗暴)」的帝國主義殖民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觀」，表示不解之意。

而在統治經營形態上，福澤在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類型上的「自治主義」與「同化主義」之間，傾向「同化主義」原則，他主張「自始便決意干涉之方針，以早晚必將之日本化為目的，施行一切處置」的同化主義原則，積極將台灣規劃為「日本本土的延長」，當然福澤的此種「同化主義」，並非真正是立基於種族一律平等上的同化，而主要是由日本殖民者的所謂「文明人」，將台灣徹頭徹尾進行「文明化」，並納入日本殖民母國的法律、制度與風俗之內，只是福澤及其後續思想支持者的這種「同化主義」主張，也引起日後日本殖民政策官僚、學者正反兩極不同的意見與爭論。<sup>17</sup>

綜上所述，福澤向日本殖民政府所主張經營台灣的大政方針，首先必須確立其前提是「將台灣全島視為無人島」，否則就是將島民視為「外國人」，由此探知對於台灣住民這個「他者」，在福澤的認知中，不但是個「蒙昧蠻民」、「敵國之民」，甚至還最好是能夠如同一縷清煙般憑空消失。同時，也因為有此認知，他主張對「可有可無」的台灣住民採取嚴刑峻罰，若有「不順從之輩，則嚴重處分，一步亦不稍假」，甚至必須「覺悟即使全島島民悉數退出境外亦不為過」。明治時期，由於當時作為「他者」中國代表的清朝積弱不振，相較於日本的國勢日隆，成為日本啟蒙家、知識分子，建立自身文化認同、開展自我意識的重要轉折與對話空間，也由於福澤大聲疾呼提倡「脫亞入歐論」，希望躋身西方文明先進國家之列，甚至殷切盼望被外國在觀念意識中視為等同「西方」國家的一分子，因此中國及其文明、文化不再作為昔日日本參照的「先進」對象，從而打入劣等的「他者」，同時，依附在中華帝國東南邊陲版圖下的台灣及其漢人住民，由於長期以

---

<sup>17</sup> 福澤諭吉的「同化主義」主張，雖經當時決議以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時的「同化政策」為模式而被實現，並成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政策的主要特色，但隨著時代潮流、情勢發展的變化，自1920年代起，受到了支持「自治主義」或「從屬主義」殖民政策學者的各種不同批判。參見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傳：外交與卓見（台北：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37。

來受到清、日雙方不同程度的「污名化」，<sup>18</sup>更被視為是次等的「他者」，至於所謂的「蕃人」原住民更不值一曬了。總之，台灣全體住民被迫剝離原鄉的「祖國」，「離散」(diaspora) 命運的印記與創傷從今而後於焉展開。

## 二、後藤新平的「台灣論」

後藤新平於 1857 年出生在陸中國膽澤郡鹽釜村貧窮的武士家庭，父親是伊達政宗臣屬留守家的家臣，其俸祿與福澤差不多，可說家境並不富裕。後藤早年學習漢學、醫學，以及從事實際的衛生行政工作，其後前往德國留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同時因為甲午戰爭之後，主持返鄉軍人檢疫工作的表現優異，受到時任陸軍次官的兒玉源太郎賞識，因而日後被擔任台灣總督的兒玉，自 1898 年 2 月起延攬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一職，迄至 1907 年 11 月轉任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社長為止，任期長達 8 年 8 個月之久，是在任最久的一位民政長官，也是日本統治台灣 51 餘年期間，影響力最為深遠的殖民地行政官僚。

後藤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可從《國家衛生原理》(1889 年)一書窺見端倪，他以其個人的醫學經驗，參酌了社會進化論、契約論，以及國家有機體論等理論，提出了所謂的「生物學原理」，認為人類就是「被放置在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激烈生存競爭中的一種生物」，而君臨百姓的「主權者」或「統治者」是為維持公共秩序而出現，如此，國家也就應運而生；「主權者」或「統治者」也同時擔負著「文明化」的使命，亦即在後藤看來，「文明」是扮演著支撐起治理國家的方策，以維持社會秩序及提高生產力，從而負擔建設富強國家的角色，文明的程度決定了競爭中的獲勝者，這也是整個明治時期日本殖民帝國的國家目標指向，<sup>19</sup>而此種深信「文明普遍性」的「文明觀」，及遵循「生物學原理」以期適切地使之文明化，也成為兒玉—後藤時期統治台灣的指導方針。

---

<sup>18</sup> 姑且不論清朝以前的各朝代人士對台灣的認知為何，僅就有清一代，作為清朝統治邊陲領土的台灣，期間曾有幾次棄留台灣之議，包括康熙 22 年 8 月起，關於台灣底定後的棄留問題，雖有有識之士證明留守之利，例如施琅的〈陳台灣棄留利害疏〉，但也不乏受到有心人士的「汙名化」，認為台灣孤懸海外，容易成為賊藪，且是個「有山則蔓草頑，有水則洪濤鹵浸」的蠻荒之地，主張「遷其人，棄其地」；1895 年 3 月，作為甲午戰爭議和的全權大使李鴻章，也曾對伊藤博文說過台灣有「3 年 1 次小叛亂，5 年 1 次大叛亂」之語，是個難以治理之地，此外，尚有「化外之民」的生番。就日本而言，如福澤諭吉對台灣及其住民有關「炎熱地方概不免為野蠻之巢窟」、「蒙昧蠻民」、「頑冥不靈」、「無智蒙昧之蠻民，常不知殖產為何物」、「到底非可以恩懷柔之輩」、「台灣為鴉片流毒最甚之地」等惡意的主觀性評價，即是最佳的代表性案例。

<sup>19</sup> 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醫學及衛生」，頁 17-19。

筆者檢視後藤關於殖民地台灣的經營思想，除了部分文章外，主要散見於其在殖民地所發布的各類公文書中。他的重要文章包括就任民政長官前夕，在總結前人統治台灣失敗的經驗教訓下，所寫就的〈台灣統治急救案〉（1898年），以及晚年總結殖民地統治經驗所寫就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1925年）。在〈台灣統治急救案〉文中，後藤開宗明義的點出：「若問何為台灣行政中最迫切改良之要項，如恢復原存在於島上之自治行政慣習，蓋為當務之急」，此等的「自治行政慣習」，當是應對住民風俗、習慣與自治的尊重；而在《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書中，他分析日本在台的殖民政策時坦言：「台灣殖民地的領有，是乘日清戰勝之威，偶然獲得的，所以毫無海外的殖民經驗，必須借鏡歐美諸國的海外殖民經驗，以為台灣殖民統治的參考」，<sup>20</sup>這裏所要借鏡的「歐美諸國」的海外殖民經驗，又以當時所議決的以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的「同化政策」模式之經驗為主，<sup>21</sup>而既是以「同化」思維為主軸，自然應與他所一貫主張「生物學原理」的理念契合，事實上，「生物學原理」也成為日後後藤誇耀其統治台灣成功的最大秘訣。只是，從他對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學生明白地告示：「你們如果要求與已經3千年來對皇國盡其忠義的日本人同等待遇，則今後以80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日本人，在此之前，縱有差別，亦無可奈何；不作不平之鳴，以為全島示範」，<sup>22</sup>又其為民政長官的訓示曾說：「所謂同化、所謂抑壓，畢竟只是著書的人任意所加的名稱，須知其內容具有複雜的關係；無論如何期待懷柔或同化，我想壓抑主義有時亦為實際所需要」等話語來看，<sup>23</sup>後藤「生物學原理」式的「同化」思想，終究就是一種社會進化論、達爾文主義般的「物競天擇」，<sup>24</sup>只有「努力同化於日本人」的台灣「適者」，才可獲得「生存之道」，反之，「不適者」只有遭受差別待遇，甚至在壓抑下過著「天年」。

而作為一位殖民地最重要的行政官僚，後藤在台灣所推動的政務與建設，其出發點自然不可能是為了殖民地人民謀福利，例如，向來為人所詬病的是，後藤在台灣為推動「鴉片漸禁政策」而採取鴉片專賣的做法，有論者就認為此一政策原應提早達成目標，但因為帶有收益性質的專賣制度是總督府重要的經濟來源，

---

<sup>20</sup> 後藤新平，**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東京：拓植新報社，1921年），頁10-12。

<sup>21</sup> 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台灣民政長官」，頁37。

<sup>22</sup> 蔡培火，「與日本國民書」，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第3冊**（台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2000年）。

<sup>23</sup> 持地六三郎，「教育問題」，**台灣殖民政策**（台北：南天書局，1998年），頁287。

<sup>24</sup> 社會進化論又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其為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將達爾文主義所提出的「物競天擇」運用到社會現象上，他認為「適者生存」的原理與「自由放任主義」是促成社會持續進步的原動力，此一理論盛行於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加速了帝國主義的發展，並為各帝國主義爭相競奪殖民地取得合理化辯護基礎。

因此花了近 50 年，幾乎等於日本殖民台灣的全部時間才竟全功；<sup>25</sup>而在教育方面，後藤與同一時期的兒玉總督，均認為「教育是一把雙刃劍」，具有高知識程度的台灣人並非好事，因為那只會「養成偏向主張權利義務之風」，所以他主張在台灣只進行有限的「實業教育」，而這似乎也是歷任台灣總督的共識之一。此外，後藤亦曾貶抑台灣人的性格為「怕死、愛錢、重面子」，他認為台灣人屬於「重視物質的人種」，而黃金與禮儀、華廈與宏園，皆是台灣人尊崇且追求的目標，因此，他提出的統治台灣之手段，無非便是「刑罰」、「利誘」與「籠絡」等，更以唐詩中的「不睹皇居壯，安知天子尊」，進而提出了「欲統治此類人種，宏偉的官衙，亦有收服民心之便」，<sup>26</sup>換言之，都市建設的美觀與威儀，除了被後藤視為「文明」的象徵外，更有威嚇土著居民的目的，這一切都顯示殖民者的政策，儘管可能有部分帶有些許的「現代化」意涵，然而這種「現代化」也必定充滿著「工具論」的色彩，甚至帶有赤裸裸的剝削與壓迫之殖民者本質面目。

### 三、新渡戶稻造的「台灣論」

新渡戶稻造不若福澤諭吉、後藤新平曾過著貧苦的童年生活般，他於 1862 年出生在南部藩的高階武士家庭，早年遠赴北海道的札幌農學校學習農業，其後前往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讀政治與國際關係，以及赴德國深造，研究農業、農經、統計及法學，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返國後，受到時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賞識，於 1901 年 2 月至 1903 年 10 月為止，被延攬擔任民生部殖產課長，其後並就任臨時糖務局第 1 任局長、殖產局長，實際從事台灣糖業的改良事業。直到 1906 年為止都還兼任台灣總督府顧問，期間每年曾前往台灣一次，因此對於日本統治台灣的現狀，應有相當程度的瞭解。<sup>27</sup>而新渡戶於 1899 年因撰寫英文版《武士道》（*Rushido*）名聞天下，辭官後，依序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第一高等學校校長、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東京女子大學校長等教職工作，1919 年起更接任「國際聯盟」事務次長，曾被譽稱「國聯閃耀明星」，聲望可謂步步高昇。此外，為後人所尊崇為「自由主義之父」的新渡戶，他於任職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期間，也同時兼任由後藤新平為紀念兒玉總督，而與志願者一起在東大捐款成立的「殖民政策講座」主講者，成為「近代日本殖民政策學的創始者與開拓者」。

<sup>25</sup> 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台灣民政長官」，頁 43-45。

<sup>26</sup> 許秀雲，「政府是一時的，城市是永久的」，<http://mail.apol.com.tw/~humeco/1today/special.htm>。

<sup>27</sup> 淺田喬二，「新渡戶稻造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東京：未來社，1990 年），頁 64。

新渡戶的重要著作包括《武士道》（1899年）、《農業本論》（1903年）、《偉人群像》（1931年）、《自警錄》等專書，而其殖民政策理論的精華部份，則收錄在矢內原忠雄所編的《新渡戶博士：殖民政策講義及論文集》，以及《新渡戶稻造全集》等專書之中。在《武士道》一書中，新渡戶雖然相當推崇中國的孔孟之學，但也評論中日甲午戰爭，「小日本」獲勝的原因，不只是靠先進的「村田槍和克魯伯砲」或現代學校教育制度，而是除了擁有肉體上的耐力、不屈不撓及勇敢外，更擁有其他民族無與倫比更「忠君愛國」的「武士道」精神，<sup>28</sup>「武士道」精神也成為形塑「日本」，以及日本國民思想與行動的靈魂之柱。而「武士道」影響當時日本人的精神層面有多大呢？僅以「戰前的日本人」自詡的李登輝總統為例，他認為青少年生活是其一生觀念與想法的根基，而這些人生觀與思想的形成，與其一出生就浸潤其中、深受影響的日本文化之根本精神，亦即「武士道」的感覺有相當密切關聯，同時，他也指出在中華民國總統任內 12 年的奮鬥，其內心的最大支柱，就是早年「日本教育」所打下的「大和魂」，也就是「武士道」精神，<sup>29</sup>可見「武士道」對於受過日本教育者的精神影響了，而武士道的闡揚，無疑地也與日本帝國日後走向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之途產生直接的關聯。

其次，探討新渡戶的「殖民論」內涵，就他而言，殖民政策可說是一種「病理學」，殖民地則為一種「病症」，由於殖民地社會出現具有「遠離本國之地」、「不同於本國的人種居住」，以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思想分歧，主奴之間的優劣容易突顯」等 3 項特徵，而使得它的「病症」屬於「變態性病症」，因此需要一種「變態統治」。<sup>30</sup>他進而主張在這變態的殖民地社會中，必須採取適合的殖民地統治策略，其中又以「同化政策」與「自治政策」最為重要。前已論及，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的策略，主要係以法國式的「同化政策」模式為主，因此本文對殖民地的「自治政策」模式並不多做討論。而「同化政策」對於新渡戶而言，是「將原住民教化成與母國擁有相同的風俗習慣宗教等，其利益乃是防止人種的反感」，換言之，就是將殖民地與被殖民者徹底「本國（日本）化」，實際上完全不尊重殖民地社會與被殖民者的統治策略，也根本無法防止人種的反感，況且尚有語言風俗上的現實差異，因此他認為「同化政策」純屬理想，甚至還悲觀地估計同化「必須要歷經 8 百年的長時間，在實際實行殖民政策之際，必須要顧

<sup>28</sup> 新渡戶稻造著，吳容宸譯，《武士道：影響日本最深的力量》（台北：先覺出版公司，2004年），頁 190、203。

<sup>29</sup> 參見李登輝著，蕭志強譯，《「武士道」題解》（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年），頁 25、77。

<sup>30</sup> 淺田喬二，「新渡戶稻造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 39。



及『時間』的要素。而且異人種根本無法同化，殖民國的人民必須要適應原住民。無論何種人種都有我們必須學習的特殊優點。在執行的方法上，能研究他們的風俗習慣歷史，學習值得學習的部份，給予必須給予的部份。……，根本上必要的是對外思想的變化，與對異人種的思想變化。只有在文化的同化上才能成就永久的帝國。今日殖民地是以劍所得，以武力統治並無法獲得永久的同化教化」。<sup>31</sup>所以，他主張殖民地住民與殖民地社會的「本國化」必須要有極長的前置準備時間，更且不只是強制殖民地住民同化，本國人也應該積極地學習殖民地原住民的優點，由於新渡戶抱持著上述觀點，因而他的殖民政策又被稱為「人道主義的殖民政策論」。儘管如此，這樣的「人道主義的殖民政策論」，並未完全掌握到同化政策的本質，其實並非只是要求被殖民者在「經濟」、「社會」權利上的同化，而最重要應求得在「政治」權利上的同化。<sup>32</sup>由於新渡戶及抱持此種同化觀的殖民政策學者，無法正確理解上述論點的缺陷，以及體認殖民地問題在本質上即為民族問題的真義，因而同樣地無法正確理解，為何在日本浩瀚「皇恩」的普照下，台灣、朝鮮等被殖民地的人民，仍會如同法國統治下的阿爾及利亞人民，前仆後繼、持續不斷地挺身對日本殖民者起義抗暴。

第三，在新渡戶此種殖民政策的觀點下，其「台灣論」的內涵又究竟為何？基本上，新渡戶因曾任職台灣總督府的高級官員，因此對於台灣及台灣民眾，有其一份特殊的情感。這也使得他的「台灣民眾觀」、「高山族觀」，相當迥異於「朝鮮民族觀」、「中國民族觀」，甚至其他的種族觀，他認為「在台灣短暫的歷史中，受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中國的統治。在數次統治者更迭之際，未見民眾間出現任何愛國心的表現，但其民眾聰明，勤奮而遵守法律。在台灣是無法施行民族自決的，這點跟朝鮮完全不同」、「台灣人是非常勤奮的支那人，雖然有使用警察權來強制他們勞動的庸吏，但根本是不需要這麼做的」、「在台灣以勞動力而言，台灣人是優於我們的」，<sup>33</sup>因此主張若能尊重此三項台灣民眾的特質，

<sup>31</sup> 新渡戶稻造，**新渡戶稻造全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頁163。

<sup>32</sup> 淺田喬二，「新渡戶稻造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41。

<sup>33</sup> 新渡戶稻造，**新渡戶稻造全集第4卷**，頁67、144；以及**新渡戶稻造全集第21卷**（東京：岩波書店，1986年），頁487。此外，他對朝鮮民族、中國民族，甚至是馬來西亞、海地等其他民族，是抱持著徹底的民族歧視觀。以其「朝鮮論」為例，他將朝鮮民族視為是完全沒有發展資質的劣等民族，在此基礎上進而演變成對朝鮮民族政治上自治能力的欠缺論，甚而賦予自治權的時間尚早論。而且，他對朝鮮民族的偏見，也演變成對朝鮮民族的國家建立、運作能力不足論，他甚至認為朝鮮民族的生存，只有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才有可能，並由此賦予對朝鮮殖民統治的正當性。此種對日本殖民帝國統治朝鮮的合理化論，也伴隨著全面否定朝鮮民族的抗日運動，他甚至對朝鮮民族的全民抗日運動——「三一獨立運動」，加以嚴詞批評為「類似兒戲的方法」，對此也可作為他並非一個「反殖民主義者」的例證；另就其「中國論」而言，在「九一八事變」前，他尊重中國民族的特性，完全沒有採取單方面的中國人蔑視論，然而，在「九一八事變」後，卻一改以往的態度，認為中國民族並不具備可以構成國家，並且運作一個國家的政治能力，而且總

則日本統治台灣的政策必能成功。此外，淺田喬二也曾藉由新渡戶對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總督府所克服四大統治「障礙」——即「山賊」、「鴉片抽食者」、「惡疾」、「獵頭族」（高山族）——的論點來探究其「台灣論」，<sup>34</sup>而基本上，新渡戶是相當支持總督府對4大「障礙」所強勢開展的統治政策，並且將此等政策評價為「善政」。例如他將抗日義軍的愛國人士，視為強盜集團般的「山賊」，並漠視日軍所採取的殺戮、鎮壓方式，且將1902年終於「根絕」台灣抗日民族運動，視為日本對於台灣的「善政」而高度讚揚：「此10年幾乎未曾聽聞山賊之事。我10年前去過台北，只要走出市區3、4公里，便有5、6個巡查員拿著來福槍，跟著保護我。但這5、6年來，就連年幼的少年都可以安全地自台灣島的這端旅行到彼端。……李鴻章說山賊依附於台灣的社會結構。他意謂山賊無法根絕於此島上。但是今日之台灣，並無任何山賊的蹤跡。這正是身為殖民國的日本所達成之第一件功績」，<sup>35</sup>然而翻開台胞抗日的血淚歷史來看，1902年後義軍的抗日義舉，依舊未屈服在日本文、武的兩手威攝之下，相反地，有愈演愈烈之趨勢。顯然新渡戶未能把握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頑強性與持續性之根本原因，就在於「殖民體制」無法消弭民族矛盾與階級對立，且只有不斷深化與激化的可能而已，同時，這也否定了前述他認為台灣民眾沒有民族自決，即不抱有脫離日本統治而求獨立的意向。而從新渡戶大力支持殖民政府的高壓作為來看，他仍舊屬於一個「殖民體制的肯定者」、「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承認者」，倘若進一步在民族平等所具有的普世價值觀點下對其進行檢視，那麼，他亦非是一個真正的「民族自決的承認者與反殖民主義者」。<sup>36</sup>

第四，就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政策而言，新渡戶對佔有中樞地位的農業政策之支持，更自不在話下了。例如在他接受後藤新平的派職擔任殖產局長，前往爪哇從事砂糖研究，回台後提出應在台灣多做調查的建議但為後藤所否決，且被要求立刻提出意見書：「然（多做些調查）此事實無必要，請（新渡戶）於未瞭解台灣之前即書就！……請以爪哇所見，眼界高之觀點書就！姑不論可行與否，請以眼界高之觀點書就！」<sup>37</sup>，就這樣，新渡戶的〈糖業改良意見書〉以「眼界高

---

結認為中國是不負責任的排外主義之民族，據以開展出其中國民族劣等論，此等「中國論」的變化，可說是他為了將「九一八事變」合理化的有力證據。參見淺田喬二，「新渡戶稻造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178-179。

<sup>34</sup> 這4大統治「障礙」最先為李鴻章與日本商議簽訂馬關條約期間，為打消日本割讓台灣之議，所列舉的清朝統治台灣時之障礙。參見淺田喬二，「新渡戶稻造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64-65。

<sup>35</sup> 新渡戶稻造，「日本國民」，*新渡戶稻造全集第17卷*（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頁221。

<sup>36</sup> 淺田喬二，「新渡戶稻造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47-48。

<sup>37</sup> 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台灣民政長官」，頁51。

之觀點」，在偏離台灣的實際情況下提出，雖然對於台灣糖業的發展有所改良與振興，使得台灣砂糖產量逐漸增加，但充其量只是為了完全滿足日本本國的國內需要，且以砂糖為中心，促使台灣的產業開始蓬勃發展，不再成為日本經濟的包袱罷了。<sup>38</sup>顯然地，殖民者對於殖民地的改良與振興，其目的充其量只是為了滿足資本家及本國的需要，而作為改良、振興主體的蔗農生活之改善卻無人聞問，對此情形，《台灣民報》曾以社論方式進行了強烈批判。<sup>39</sup>此外，亦有台灣作家楊雲萍的〈黃昏的蔗園〉一文，如實地刻畫了日本強制收購土地、本土製糖業的崩解、製糖會社剝削蔗農等情事外，即便日本作家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一書，也曾描述了日本東北移民到台灣的窮苦農民被製糖會社剝削之情況。綜上所述，除了 1930 年 10 月的「霧社事件」外，新渡戶的「台灣論」係無條件的支持日本在台灣實施的殖民統治政策，未曾對日本帝國主義提出過批評意見，<sup>40</sup>而對於「霧社事件」的譴責與批判，也只能看作是他對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少數從真正面相加以批判的稀有特例。

#### 四、矢內原忠雄的「台灣論」

矢內原忠雄於 1893 年出生在愛媛縣，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後，曾前往英國、德國、美國留學進行殖民政策的研究，為自由主義殖民政策學者的最高代表人物。矢內原不但是新渡戶的學生，同時也是繼任者，從 1923 年 8 月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同年 12 月起，一直到 1937 年 12 月因反對軍國主義、天皇制得罪當局的「筆禍事件」而被革職離校止，他都接替新渡戶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殖民政策講座」的主講者。矢內原對於殖民政策研究的著作、論文甚豐，代表性者包括《殖民及殖民政策》（1926 年）、《殖民政策的新基調》（1927 年）、《人口問題》（1928 年）、《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1929 年）、《滿洲問題》（1934 年）、《南洋群島之研究》（1935 年）、《民族與和平》（1936 年）、《民族與國家》（1937 年）、《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印度》（1941 年）等專書。他的殖民政策論特徵，最重要的就是從民族「自主主義」的立場，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朝鮮等地的殖民統治政策，所採取「同化主義」、「內地延長主義」，甚至後期發動的「皇民化」運動，展開猛烈的批判，

<sup>38</sup> 參見李登輝著，蕭志強譯，「與新渡戶稻造先生的邂逅」，頁 75；以及北岡伸一著，魏建雄譯，「台灣民政長官」，頁 52。

<sup>39</sup> 「絕對不採取經濟榨取的方針」，《台灣民報》，第 3 卷第 7 號（大正 14 年 3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90。

<sup>40</sup> 淺田喬二，「新渡戶稻造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 178。

並且更不諱言地斥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新衣服」。<sup>41</sup>同時，他認為：「所謂同化主義係指一種對殖民地給與完全同等待遇的主義，因為殖民者是直接以殖民國國民的身份資格移居至殖民地，所以應該被賦予如同在殖民國中的同樣權利、同樣保障、同樣自由，將殖民地作為殖民國的延長。而對於原住民也必須倣效，使其獲得與殖民者同樣的法律經濟社會之制度」，但他也真切感到「殖民地統治，在政治上、經濟上，再則教育上完全都是同殖民國的，是殖民國中心的。……向來，同化的殖民政策之特色，就是對殖民地住民要求在經濟上及社會上同化的同時，卻拒絕政治上權利的同化」，<sup>42</sup>換言之，在矢內原看來，「同化主義」的特色，只剩下被殖民者與殖民地社會的徹底「殖民國化」，以及強制抹殺被殖民者的民族個性，同時它也是一種強烈抗拒政治權利的同化，<sup>43</sup>因此日本「同化主義」的真正面目，說穿了就是將被殖民者徹底的「日本化」。

其次，矢內原更進一步探討「同化主義政策」與「軍事鎮壓政策」之間的內在關係，他認為：「同化主義往往是意味著對原有居民社會的法制、語言、習慣、宗教等進行破壞性的干涉，因此大多容易挑撥原有居民的反叛，從而使殖民政府必須使用鎮壓反叛的武力。……此種軍事上的支配與同化主義往往伴隨而生，因此在軍事統治的時期，同化政策係最可以放心施行的。……兩者之間共通的基礎，係以本國為中心的絕對支配主義。同化政策為其文化上的展現；而軍事政策為其武力上的展現」，<sup>44</sup>換言之，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假面，有其「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特性，「一個中心」就是以「日本本國的絕對支配主義」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就是「同化主義政策」與「軍事鎮壓政策」，倘若套用現代人所熟悉的語言來說，這就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文」、「和」與「武」、「戰」兩手策略。正因為有此分析，他強烈地批判同化主義政策，係憑藉著對殖民地強行要求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與思想上的同化，卻完全忽視了一個事實，即殖民地住民為歷史上所形成具有種族獨立性及民族個性的社會存在物，例如台灣、朝鮮與日本一樣，都是個別的「歷史社會」，而因為同化主義政策侵害了被殖民者的「集團人格」，破壞他們社會生活的基盤，使其生活力枯竭，因而使得殖民地住民的反抗成為必然之事，因此日本想要以統治政策來同化台灣、朝鮮是不可能之事，他

---

<sup>41</sup>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民族問題」，*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2年），頁209-210。

<sup>42</sup> 矢內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東京：有斐閣，1935年），頁248、469。

<sup>43</sup> 矢內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植民政策比較の一論」，*矢內原忠雄全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年），頁290。

<sup>44</sup> 矢內原忠雄，「軍事的と同化的・日仏植民政策比較の一論」，*矢內原忠雄全集第4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年），頁290。

斷言「同化政策本身就是一種謬誤」，甚至說「沒有比單單以外在生活的同化視為內心的同化，來得更愚蠢的事」，<sup>45</sup>認為即便有可能同化，也必須要歷經「數百千年」的過程，<sup>46</sup>並非僅憑藉著強力政策就可以實現。在日本軍國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矢內原對同化主義政策的強烈批判，無疑地是對日本殖民帝國的當頭棒喝。

第三，由於矢內原反對同化主義的殖民政策，因而提倡採取「自主主義的殖民政策」，其主要的政策內容就是設置殖民地議會，賦予殖民地住民對於殖民地統治表現自由意志的機會，使渠等能對殖民地統治的未來懷抱希望，他認為：「苟能使野蠻未開化之種族，盡可能地承認該殖民地人民之參政權，係健全鞏固殖民地統治之第一要件。對於台灣與朝鮮等人口眾多歷史悠久的社會而言，承認住民的參政權本即係正義之要求，同時亦可有助於帝國本身團結之鞏固」。<sup>47</sup>儘管矢內原對於老師新渡戶相當推崇，然而關於這點，卻表現與他相當不一致的主張：「就朝鮮人對於朝鮮統治的參與方式而言，唯有倚賴朝鮮議會的方式。藉由此種方式，方可始民意暢達，使朝鮮人獲得對其前途獲得信心與希望，也才能使日本人免於將朝鮮人視為『俎上肉』而自居的疑惑。因此，只有就朝鮮人而言，沒有不安與困惑的時候，以及能夠減輕此種憂慮，而獲得希望的時候，對朝鮮的統治才能獲致鞏固的基礎」，<sup>48</sup>如此一舉推翻了新渡戶關於朝鮮民族政治上自治能力的欠缺論等諸偏見。當然，如同淺田喬二所言，矢內原之所以主張立基於承認殖民社會特殊性的「自主主義的殖民政策」，以及設置相關的殖民議會，甚至更進一步主張承認殖民地台灣、朝鮮自日本帝國統治下和平地分離、獨立，主要是認為，以帝國主義進行殖民統治，必然地會培育出與自己（母國）敵對的勢力，他甚至說出更發人深省的警語：「弱者被壓榨；愚者被欺騙，從而被欺騙者必須變得更強更睿智。而此種力量，此種智慧，殖民地住民即是來自殖民者，可說是一件奇妙的歷程」，<sup>49</sup>因此其目的還是希望能夠促成日本帝國主義與殖民地台灣、朝鮮之間的堅強結合，以作為日本殖民統治的「穩固基礎」，<sup>50</sup>以此觀之，矢內原的「自主主義的殖民政策」，除了正義與人道的關懷之外，主要是認識到帝國

<sup>45</sup> 矢內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頁 311；「朝鮮統治の方針」，**矢內原忠雄全集第 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63 年），頁 732。

<sup>46</sup> 矢內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頁 314。

<sup>47</sup> 矢內原忠雄，**矢內原忠雄全集第 1 卷**，頁 284。

<sup>48</sup> 矢內原忠雄，**矢內原忠雄全集第 1 卷**，頁 191、227、742-3。

<sup>49</sup> 矢內原忠雄，**矢內原忠雄全集第 1 卷**，頁 227。

<sup>50</sup> 淺田喬二，「日本帝國主義と植民地問題」，**日本知識人の植民地認識**（東京：校倉書房，1985 年），頁 14。

主義殖民統治的自我矛盾性，同時也摻雜些許「工具性」的考量，因此他也稱不上是一個真正的「殖民地獨立論者」。

第四，矢內原也被視為是日據時期最同情台灣人處境的日本「左派」學者，他的「台灣論」主要展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書中，要點有：(一) 就台灣內部的「民族問題」而言，基本上他從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觀點出發，認為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所必然產生的台灣社會經濟之資本主義發展，正是促使台灣民族運動發生的政治、經濟上之根源。此外，他也明白指出，「日本的台灣統治，是拿台灣拉開中國而與日本相結合」，而為了達到「去中國化」，兒玉、後藤特別避免採取激進主義式的「震盪療法」，並在所謂「生物學原理」的基礎上，實行適應於台灣「特殊性」環境的政策，然而此種別有用心的動作，其目的仍在於確立日本的政治經濟權力，而這也是日本統治的主要目的；<sup>51</sup>(二) 他進一步分析了歷任台灣總督所揭示的施政方針，並以 1918 年至 1919 年為劃分點，區分為前期承認台灣的「特殊性」認識，以及後期納入日本帝國的「普遍性」要求，這些就是曾被矢內原斥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新衣服」的「內地延長主義」、「同化主義」與「皇民化」運動了，同時，他也認為統治台灣的成功與否，包含著內、外兩個關鍵因素，在外因素方面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情勢變化，特別是當時以國民黨為中心所開展民族主義式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之蓬勃發展，<sup>52</sup>進而影響台灣民眾在政治、社會上的自我覺醒；(三) 他於 1929 年評價當時日本統治台灣 30 餘年的功過，認為雖然日本的治績值得讚美為殖民地經營成功的稀有模範，日人的殖民統治能力獲得證實，台灣人的生產力、富裕及文化程度亦較前大為提高，惟他也畫龍點睛地指出台灣住民的參政權仍等於零，而總督專制的極端，同樣地亦為世界殖民地中稀有的事例。<sup>53</sup>綜上所述，對於殖民地的問題，如同矢內原所說，他是抱持著「被虐待者的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而自主獨立的和平的結合」之宗旨來從事研究的，<sup>54</sup>雖說與他身為虔誠的基督教徒有關，但此種立場在當時確實需要極大勇氣與犧牲決心，而這也正是矢內原的殖民論之所以如此受到重視的原因。

## 五、泉哲的「台灣論」

<sup>51</sup>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民族問題」，頁 206。

<sup>52</sup>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民族問題」，頁 220-221。

<sup>53</sup>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民族問題」，頁 225。

<sup>54</sup> 矢內原忠雄，**植民及植民政策**，頁 607。

泉哲於 1873 年出生在北海道，曾就讀札幌農學校，也曾前往美國洛杉磯、史丹福、哥倫比亞等著名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學、國際法 16 年之久。他從 1914 年至 1927 年，就作為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的講師，而且是擔任殖民政策與國際法的講授學者，也因此成為日本代表性的殖民政策學者及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其著有《殖民地統治論》（1921 年）、《國際法概論》（1921 年）、《國際法問題研究》（1924 年）等專書。在代表泉的殖民政策思維的《殖民地統治論》一書中，他將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統治政策，區分成「同化主義」與「非同化主義」兩者，基本上他認為，「同化主義」是被無意識地採用的殖民地統治方針，各殖民帝國最初至少都會採用一次這種主義，以達成對「異人種的統治」，他更進一步分析「大部分的情況都是對於殖民地人民課予義務時採用同化主義，而對於賦予權利則採取不予承認的做法。非但如此，同化主義有走向形式化的傾向，呈現出忽略精神層面的觀點。換句話說，同化主義就是一種沒有方針的統治政策，也可說是一種臨機應變的，暫時性的方案。因此其不具有永續的性質，而面臨必須在盡可能短暫的時間內就被廢止的命運。因此我們可以認定，所謂的同化主義就是指本國本位的統治方針，並不是著眼於殖民地的幸福安寧。這可說就是今日殖民統治方針極端不合理的原因」，<sup>55</sup>像這樣只求盡義務、不予享權利的「同化主義」，實際上就是對殖民地及其人民的榨取與剝削，殖民地充其量只是「如同乳牛的畜牧地」，以及以「作為本國的倉庫」為唯一目的。泉並且以法國作為「同化主義」的代表來作分析，在他看來：「法國的殖民統治政策，可說是中央集權式的……。就殖民地的行政官而言，仍必須一一服從上官的指揮命令的制度……。殖民地官吏如果沒有總督或是上級官吏的指揮命令的話，亦無法獨立推動公務。故殖民地官吏對於殖民地的行政，並沒有辦法根據自己的興趣，以具有獨創性的態度處理事務。非但如此，而且由於總督的任期短，而且每隔數年就變更就任地，因此要瞭解地方的情況並不容易。即使是一個有為的總督，亦無法充分的展現其手腕，而變成只是類似本國政府的命令傳達機關一般」，<sup>56</sup>泉因此批評此種統治政策仍係「本國中心主義」，本國政府無視於殖民地的實際狀況，對於統治的細節問題進行非常繁瑣的限制、規定，使得殖民地的行政機關變成上命下達的機關，無法反映被殖民者民意之餘地，同時，這種制度也會妨礙殖民地行政長官發揮獨創性，<sup>57</sup>而仿效法國殖民統治政策的日本殖民帝國，在長達 51 餘年的殖民統治過程中，出現上述重大缺陷的情形，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sup>55</sup> 泉哲，*殖民地統治論*（東京：有斐閣，1924 年），頁 243、247。

<sup>56</sup> 泉哲，*殖民地統治論*，頁 316、222-223。

<sup>57</sup> 淺田喬二，「泉哲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 196-197。

其次，泉哲所謂的「非同化主義」，則是基於自覺的統治主義，藉由擁有殖民地經營的豐富經驗，在理解被殖民者的心理之後，所形成的真正殖民統治方針，他將此種「非同化主義」等同於「自治主義」，而且以英國為採取非同化主義、自治主義的代表國家。<sup>58</sup>從泉以上的分析可知，他所積極支持的殖民統治政策是「非同化主義」、「殖民地本位主義」，並且強烈的反對「同化主義」、「殖民國本位主義」。只是，儘管泉受到了「大正民主時期」（1912年至1925年）運動的洗禮、強調順應世界民族自決的潮流、重視民眾輿論政治的訴求，同時也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反對任何人種與民族上的種族歧視，因而大力批判此種「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劃分為優、劣等民族之作法，然而，其立論背景不免也隱藏著「黃種人之負擔」、「不可背棄文明的神聖委託之統治方針」等殖民主應行之神聖使命思維，他指出：「由文明國家擔任未開化或是半開化的領土統治的任務，本身就是一件極為光榮或是極大的任務，因此應該要將設法增進殖民地人民幸福，與促進文化發展兩件事，作為殖民地統治的大方針」、「殖民國所賦予殖民地的，不單單只是物質上的文化，也應該包括精神上的文化在內。處於奉獻的地位比處於壓榨的地位要更加幸福的多，是無庸置疑的，就殖民國而言，也是一件極為榮譽的事」。<sup>59</sup>換言之，泉認為只要能夠達成上述目的，即使沒有得到其他任何實質利益，都可說是實現了作為「文明國家」的殖民國之任務，以及保全了作為一個文明國家所應負的義務。

第三，那麼泉哲「台灣論」的內涵究竟為何呢？其要點有：（一）泉對於殖民地台灣所施行的「武官總督制」及「警察政治」，抱持著強烈批判態度，他認為若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因為治安狀態尚未穩定，任用軍人作為總督猶能理解，惟「一旦島內的治安平靖之後，就無必要以軍人擔任總督了。所謂的軍人這種職業，其常態原本就是只有受到軍事方面的教育與刺激，缺乏政治方面的智慧」，<sup>60</sup>因此他主張若要統治台灣，必須尊重台灣人的習俗與傳統，並充分顧及渠等之特質。此外，並嚴詞抨擊「六三法」與「三一法」賦予總督無限上綱的行政命令之權力，<sup>61</sup>認為此等法律「對於台灣島內的居民來說，如同蛇蠍般令人厭

<sup>58</sup> 泉哲，**殖民地統治論**，頁197。

<sup>59</sup> 泉哲，**殖民地統治論**，頁95-96。

<sup>60</sup> 泉哲，「台灣統治策變更の必要」，東洋協會編，**東洋時報**（東京），第247號（1919年4月），頁10。

<sup>61</sup> 日本佔領台灣後，鑒於台灣的情況與日本「內地」不同，因此另訂一套法制，賦予總督特殊的立法權，而在台灣採取「特別法」的方式。其後日本政府以「法律第六三號」（簡稱「六三法」）頒布「有關施行於台灣之法律」，並自1896年4月1日起實施；「六三法」實施至1906年12月31日，被「法律第三十一號」（簡稱「三一法」）取代，但在本質上還是「六三法」的延續；



惡」，他諷刺「對於駑鈍的軍人總督而言，此等授權彷彿是給予幼兒一把利刃一樣，無啻是最危險的武器」；並且將「武官總督制」論斷為一種「警察」、「憲兵」、「軍隊」3者彼此協助、強勢開展的「警察政治」，認為「在一個國家的政府內，將司法部門與警察部門置於同地位，則該國將完全成為警察政治的國度，國民非但無法受到法律的保護，甚至應說在警察的壓迫與監視之下，過著痛苦的生活」。<sup>62</sup>

(二) 泉對於台灣總督府表現在禁止台日通婚、妨礙台民接受高等教育、剝奪台民創立公司經營事業、強迫農民栽種甘蔗等人種、民族及社會方面之歧視，以及經濟方面之壓迫，歸結為：「總督府以及日本國內的人，對於台灣島民的態度，就彷彿文明國家的人，對待野蠻人或是動物一樣」。<sup>63</sup>此外，針對殖民地的教育方針，他除了抨擊當時以「實業教育」、「物質教育」而非以「普通教育」、「精神教育」為本位的方針，該等教育只能是「勞工的培養所或是納稅機器的製造所」外，也大力主張殖民地教育時的常用語，應該採用殖民地住民的語言，因為「語言」是用來表示民族的文化、思想或是習慣等，倘若根據殖民國的語言來進行普通教育的話，將使得「殖民地固有的文化中斷，使他們的思想、宗教、習慣、道德等一切頹敗，並且導致殖民地人民的精神引發極大的混亂。其結果就是雖然以殖民國的語言進行普通教育，但是卻得到了內在不良性的人民」，<sup>64</sup>他論斷，以殖民國語言推動的普通教育，對於殖民國而言雖然較為方便，但是對於被殖民者而言，可以說沒有比這個更不幸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說是一種「最無謀略的舉動」，在這種教育體制之下，要將台灣人培養成「善良的島民」是不可能的。泉具體指出台灣教育政策改革的重要性，就是要採用與日本本國相同的教育政策，實施沒有人種歧視的教育方針，這是在其他的自由主義殖民政策學者中所看不到的，亦是泉的「台灣論」特徵之一。<sup>65</sup>

(三) 泉在〈促進台灣統治政策的根本變革〉一文中，主張在殖民地台灣應該採取「自治殖民論」，也就是日本對台灣的統治政策，必須是「殖民地本位主義」，即「台灣本位主義」不可，他更直言：「台灣並不是總督府的台灣，而是台

---

「三一法」於1921年底，又被「法律第三號」（簡稱「法三號」）所取代。

<sup>62</sup> 泉哲，「台灣統治策變更の必要」，頁10。

<sup>63</sup> 泉哲，「台灣統治策の根本的變革を促す」，*太陽*（東京），第26卷第8號（1920年7月），頁109。

<sup>64</sup> 泉哲，*殖民地統治論*，頁258。

<sup>65</sup> 淺田喬二，「泉哲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221-222。

灣島民的台灣」。<sup>66</sup>然而現今總督府採行的是「日本本位主義」的政策，不是爲了島民的安寧與利益而進行的，這也就是爲何台灣人沒有一個對日本統治感到滿意的原因所在，他相信「當台灣人能夠獲得台灣內政的治理權時，也就是台灣人會讚揚日本善政的時期之到來」。<sup>67</sup>由於有此認知，當 1919 年 10 月，作爲總督府首任文官總督的田健治郎上台，並且實施了包括使州、市、街庄成爲地方公共團體而具有法人資格在內的地方制度「改善」後，泉對此雖仍有所批評，但卻給予部分肯定，並且評價爲台灣「地方自治化」的第一步，認爲「將台灣建設成地球上最良善最美麗樂園的曙光浮現了」。<sup>68</sup>然而如同淺田喬二所言，泉此種對於經由殖民地自治，進而達成事實上的民族解放與民族國家之想法，未免過於美化與樂觀，也忽略了殖民地仍舊處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也欠缺將帝國主義時代殖民支配所產生的民族壓抑、矛盾、對立問題，即「民族問題」的本質，作爲殖民地問題的核心部分而探究之觀點，認爲若未掌握問題的本質核心，而去談論民族解放的「遠景」是不可能的。<sup>69</sup>因此發生在 1923 年 12 月 6 日的「治警事件」，<sup>70</sup>可以說對於泉在理論或實際上所強力支持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只是泉於事件後所發表〈台灣的將來〉一文中，在表達遺憾的同時，也只能鼓勵運動者不要因爲悲憤感慨而輕舉妄動，仍然必須以「溫和、漸進」方式，以及需要「忍耐、努力與時間」來繼續推動，而基本上他對此次鎮壓表示「並不是散播任何悲觀的種子，反而有助於使目的提前達成」之觀點，<sup>71</sup>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本質的估量，亦同樣屬於太過樂觀與天真。綜上所述，一般而言泉的「台灣論」較其「朝鮮論」，雖然有著較爲寬鬆、獨特的「自治殖民論」色彩，也超越同時代其他自由主義殖民政策學者（例如山本美越乃、矢內原忠雄等人）的理論思維，<sup>72</sup>但終究欠缺對當時絕對主義的天皇制度進行批判的勇氣與能力，

<sup>66</sup> 泉哲，「台灣島民に告ぐ」，*台灣青年*（東京），第 1 卷第 1 號（1920 年 7 月），頁 7。

<sup>67</sup> 泉哲，「台灣統治策の根本的變革を促す」，頁 112。

<sup>68</sup> 泉哲，「台灣自治制を評す」，*台灣青年*（東京），第 1 卷第 3 號（1920 年 9 月），頁 16。

<sup>69</sup> 淺田喬二，「泉哲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 229-230。

<sup>70</sup> 台灣民主運動人士爲了更強力的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於是於 1923 年 2 月 16 日，在東京組成了「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此一「同盟會」原係於 1923 年 1 月 16 日在台北創立，惟卻於 2 月 2 日被根據「治安警察法」的規定而被禁止，於是，「同盟會」就將總部移往東京，使之合法化。然而，台灣總督府卻認爲「同盟會」的實體在台灣，而且是擾亂台灣的「安寧秩序」之非法結社，於是在 1923 年 12 月 6 日凌晨，以「治安警察法」爲藉口，將「同盟會」會員全部予以逮捕，這就是相當引人議論的「治警事件」。同時，由於這次事件而被傳喚、住家被搜索、被拘提的人士高達百人左右，29 人被移送檢察署，其中 18 人遭到起訴。對於此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大舉鎮壓，無論是在日本或台灣，都是相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甚至在日本的中央政壇也引起了震撼。

<sup>71</sup> 泉哲，「台灣的將來」，*台灣*（東京），第 5 年第 1 號（1924 年 4 月），頁 3。

<sup>72</sup> 泉哲的「台灣論」，不斷地強調民選的台灣議會設置之必要性，惟在其「朝鮮論」卻僅主張使用暫定法律，把中樞院改變成「一院制」或「兩院制」的立法機關，並未強力主張賦予朝鮮人的參政權及設置朝鮮議會的必要，然而比較起來，泉的「朝鮮論」進步性，較不如前述矢內原忠雄

因而仍無法避免地向現實的政治勢力、侵略的時代潮流屈服、妥協。

## 六、細川嘉六的「台灣論」

細川嘉六於 1888 年 9 月出生在富山縣新川郡泊町，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政治系畢業，他從 1920 年至 1936 年，擔任大阪「大原社會問題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專長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研究「米騷動」、帝國主義、日本殖民地等問題，並且從 1936 年後，開始採取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且在當時具有影響的輿論界人士之雜誌《改造》、《中央公論》上，強烈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政策，並曾以畢生精力發表時論《亞洲民族政策論》。此外，1942 年 7 月，日本《改造》、《中央公論》等雜誌編輯在富山縣集會，惟卻遭橫濱警方特高課認為是「密謀重建共產黨的會議」，因而在 1942 年至 1945 年間，以涉嫌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逮捕了涉案的 60 多人，造成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規模的言論鎮壓事件（即「橫濱事件」），在此事件中細川也因發表〈世界史的動向與日本〉一文，無法倖免於難而遭逮捕入獄。戰後，細川加入日本共產黨，並曾當選參議院議員，被稱為「真正的人民民主主義者」、「日本的帝國主義研究的先驅者」，其著作、論文頗豐，代表性者包括〈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1925 年）、《殖民政策批判》（1927 年）、《中國革命與世界的明天》（1928 年）、〈帝國主義論〉（1929 年）、〈中國民族運動與列強〉（1939 年）、《亞洲民族政策論》（1940 年）、《殖民史》（1941 年）等。

細川的殖民政策論述內容，最主要的部分展現在《殖民政策批判》、《殖民史》、〈東亞共榮圈的民族問題〉等專論之中。只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者，他是將對「殖民政策」的研究，視為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因此常以「民族政策」的概念取代它。儘管如此，細川仍然強調殖民活動的現代本質，係來自於帝國主義國家過剩資本的輸出，他稱之為「輸出資本殖民」，此種理解基本上可以說是沿著列寧（Vladimir I. Lenin, 1870-1924）的「帝國主義論」（即《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原始理路來開展的。而細川「帝國主義論」的特徵，首先是承認在帝國主義國家統治下的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由此也逐漸孕育出殖民地、被殖民者以廢除帝國主義統治為目標的「民族國家主義運動」；其次是因帝國主義國家「輸出資本殖民」的本質而產生的競爭，將無可避免地引起帝國主義

---

的相關思維。參見淺田喬二，「泉哲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 234。

國家之間的「世界戰爭」；第三，由於「世界戰爭」儼然成形，將加深帝國主義國家的軍備競賽，進而促進帝國主義國家的「軍國主義化」，因此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國外民族的壓迫，對國內政治改革的反動也會強化。<sup>73</sup>在這些特徵之下，他將殖民地問題置於日本帝國主義史的研究之中，進而將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視為立基於帝國主義（東亞）世界體系殖民統治的一環而成立的。同時，他也認為：「日本殖民史是世界史發展的結構性的一部份，因此明顯地不免會受到世界史發展大勢的影響」，<sup>74</sup>而在列強對世界政策的對立日趨激烈之時代，日本帝國與列強之間應處於何種關係，以及如何實踐諸殖民地的領有，則為細川殖民政策論述所關切的迫切問題。此外，他認為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將對此等國家產生「資本主義化」的作用，抱持著既有「促進」亦有「壓抑」的二面觀點，例如他就殖民地台灣的糖業發展而言，認為「完成了使所謂亞洲封建農業部門的發展停滯之資本主義化、獨占化的糖業」；就殖民地朝鮮而言，則認為從「日韓合併」之後的「朝鮮處於日本強大政治力與經濟力的支配之下，作為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隨著外來的變動而邁向近代化道路。正因為此種近代化並非藉由朝鮮自身發展而推動的，所以不得不採取特異的型態」，<sup>75</sup>細川對此一問題所採取的部分肯定觀點，也相當迥異於前述矢內原忠雄的主張。

那麼細川的「台灣論」的實質內涵為何呢？首先，基本上細川是抱持著「民族平等」的立場，將佔台灣住民絕大多數的「漢民族」視為「優秀民族」，並且不認同當時的許多日本官民，甚至自由主義學者所採取的中國民族歧視觀、劣等觀，以及渠等以此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統治中國的合理化藉口。他進一步主張由於約3百萬「優秀民族」的「漢民族」（＝「本島人」）實際掌握台灣的經濟實權，而認為「此民族攝服於我國國威與否，實為日本統治台灣成敗之鑰」，<sup>76</sup>只是細川視為「優秀民族」的本島漢民族，在多數殖民者眼中，仍然只是具有「奴隸般」特性的「被殖民者」罷了；其次，細川在觀察日本佔據台灣以來的農民階級、勞工階級，以及「中產階級」的特徵與階級結構之變化後，一方面雖曾如同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般，也相當自信地論斷台灣民族運動，從以前的以知識階級為主導的運動，開始轉變為以農民、勞工為主體的運動。此外，更認為由於受到政治與經濟上的壓迫，將有許多台灣住民的積極參與，套一句共產黨的用語，即台灣民族運動將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方式來展開的。然而另一方面，

<sup>73</sup> 淺田喬二，「細川嘉六の植民論」，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頁534-536。

<sup>74</sup> 細川嘉六，植民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41年），頁487-488。

<sup>75</sup> 轉引自淺田喬二，日本知識人の植民地認識，頁33-34。

<sup>76</sup> 細川嘉六，前引書，頁105-106。

受到「九一八事變」的影響，日本殖民當局進行鎮壓較前為甚，民族運動的開展也較不如前，惟細川主張單靠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民族運動之鎮壓，並無法封閉台灣民眾對民族平等的理念，以及基於此一理念而要求與日本人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平等，進而實現民族獨立運動；第三，他歸結而論，台灣的「民族問題」，在內有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外有中國本土的政治、民族運動直接或間接呼應與奧援之影響下，是絕對無法根除的，同時，台灣的「民族問題」，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必然發生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民族矛盾、對立，以及凸顯台灣人的民族自決、獨立問題之迫切性。因此為解決此一「民族問題」，他認為應該完全廢除日本帝國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或對台灣民族的壓迫，換言之，只有承認台灣人的民族自決權，容許台灣人民族獨立的方式而已，<sup>77</sup>細川如此秉持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當時言論管制極為嚴格的時代中，對日本帝國統治台灣所進行痛切的指責與批判，實在值得研究與重視。

### 第三節 日本文學家的「台灣論」

對於殖民地台灣時期的日人文學遺產，台灣文學耆老龍瑛宗曾將之區分為 2 類，即「異國主義」（異國情調，exoticism）文學與「寫實主義」（realism）文學，而所謂的「旅行文學」也包含在內，這其中部分作家曾旅行或短期居留台灣，當然也有從未到訪，僅憑藉著「想像」來書寫台灣。而較具代表性的日本作家，屬於「異國主義者」有佐藤春夫；屬於「寫實主義者」有大鹿卓（1898-1959）、庄司總一、中村地平（1908-1963）、西川滿、濱田隼雄等，<sup>78</sup>這其中又以庄司總一的《陳夫人》、西川滿的《台灣縱貫鐵道》與濱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等三部比較紮根於台灣土地的傑出長篇著作，也較為台灣民眾熟悉與關注。本章所賴以分析的日本文學家之作品篇章、發表時間及地點，如表 3-6。

表 3-6 本章有關的日本文學家作品篇章、發表時間及地點

姓名	生卒年	作品篇章	發表時間	發表刊物
----	-----	------	------	------

<sup>77</sup> 淺田喬二，「細川嘉六の植民史」，日本殖民地研究史論，頁 606-607。

<sup>78</sup> 龍瑛宗，「日人文學在台灣」，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com/com\\_a10.htm](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com/com_a10.htm)；此外，對於西川滿的文學，亦有人認為是屬於「異國主義文學」，參見本章後續討論。

佐藤春夫	1892-1964	〈彼夏之記〉、〈魔鳥〉、〈殖民地之旅〉	1921-1937	陸續發表於日本《改造》、《新潮》、《童話》、《中央公論》等雜誌，後收錄於昭森社出版之《霧社》一書
庄司總一	1906-1961	《陳夫人》	1940-1942	日本通文閣出版
西川滿	1908-1999	《梨花夫人》、〈赤崁記〉、〈採硫記〉、〈龍脈記〉、《台灣縱貫鐵道》	1940-1944	《文藝台灣》雜誌
濱田隼雄	1909-1993	《南方移民村》	1941-1942	《文藝台灣》雜誌

## 一、佐藤春夫的「台灣論」

佐藤春夫於 1892 年生於和歌縣新宮，曾就讀應慶大學文學部，其文學著作豐富，代表作有《都會的憂鬱》、《田園的憂鬱》、《支那雜記》，以及編有《支那印度短篇集》、《世界紀行文學全集（樺太・朝鮮・台灣・南洋諸島編）》等小說、詩集。而佐藤與台灣之間的淵源，肇生於 1920 年 6 月因對好友谷崎潤一郎之妻的同情與愛戀的「鬱屈難遣」情傷，加上巧遇之舊友頻頻以「舌燦蓮花地述說他現住的地方有多有趣」，而「未見的南國幻影一幕幕浮現眼前…我不覺引頸傾聽入神了」，<sup>79</sup>因此造訪台灣 3 個月，期間取得了重要的寫作素材，返日後於 1921 年起陸續寫就了〈日月潭遊記〉（1921 年 7 月）、〈魔鳥〉（1923 年 10 月）、〈旅人〉（1924 年 6 月）、〈霧社〉（1925 年 3 月）、〈女誠扇綺譚〉（1925 年 5 月）、〈殖民地之旅〉（1932 年 9 月至 10 月）等 10 餘篇作品，文字內容敘述平實近人，惟情感卻纖細深遠，因而與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堪稱同為日本大正時期最著名的作家。

從佐藤的自述中可知，台灣之旅無疑地對其而言，確實充滿了「異國情趣」的一面，<sup>80</sup>但另一方面也被論者視為是一篇篇日本「內地人」或內地知識分子，直接、親身地與台灣「本島人」，或包括詩人、畫家、書法家，甚至民族運動家在內的本島秀異知識分子會面之全紀錄，從而凸顯了殖民地台灣內部的「殖民者」

<sup>79</sup>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彼夏之記」，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出版公司，2002 年），頁 339。

<sup>80</sup>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彼夏之記」及「殖民地之旅」，頁 285、359。

與「被殖民者」之間關係的作品。<sup>81</sup>例如在〈魔鳥〉一文中，佐藤藉由霧社原住民傳說的「魔禍伏鳥」故事，從內心深處審思「文明人」與「野蠻人」之間，無論對生命的尊重、風俗的迷信、行事的霸道等方面，事實上並無不同，因而曾直言批判日本殖民政府這個所謂「文明國」的「理蕃政策」：「某個國家的殖民地，在那裡，這個文明國的人把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擁有相當文明的人，因其風俗習慣相異，對待他們雖沒有到殺害的地步，卻把他們當牛馬一樣。這也是文明人要把表情異於他們的別的文明人壓倒、使役的一個常例。還有我也看過某一個文明國的政府，對一種和當時的一般國民的常識稍異其趣的思想——依其思想，一般人類可能將有更幸福的思想者抓起來，認為其為危險的思想，屢屢把這種思想家關進牢裡，有時甚至不留餘地處以死刑。文明人也和野蠻人一樣，把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物全都當做是惡，而努力地把那不可解的表情——有靈魂的表情，根除斷絕」。<sup>82</sup>

儘管受到大正民主時期的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風潮影響，然而集詩人、小說家及文學家於一身的佐藤，對於眼見殖民地或被殖民者被壓迫情形，只能進行內心深處的審思，既無法，也不能改變任何現狀，以至於旅台期間，每每聽到本島人表示對日人統治的反抗議論，便裝做迷糊不知或「總是很自然地盡可能避開」，<sup>83</sup>當然佐藤也曾正面遭遇過難以避開、最為棘手的時刻，那就是前往本島第一大家——霧峰林家，拜會台灣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及民族運動的先趨者林獻堂，面對林氏直指殖民者的「內地人」與被殖民者的「本島人」之間的差別與關係等核心問題，尤其是關於總督府朝令夕改地採取「平等」、「親和」或「同化」殖民政策的質問時，只能逃避問題的核心，儘量撇開「同化論」與「平等論」的固有爭論不說，另立一種在不可知的未來才可能實現的「友愛說」：「同化或是平等之類的想法，在根底上，一開始就是基於把內地人與本島人區別開來的認知，……與其固守本島人、內地人這種地理上、歷史上的小區別，不如代之以：同樣是人類，應站在同一點上。在其立腳點上，訴諸人類同志的友愛。……不要囿於土地、種屬的區分，應該以大家都是現代世界人類的一員這一點當做是唯一的基礎。因此，今日沒辦法做到這一點，乃是因為本島人、內地人都還持有過渡時代未開的文明，彼此急於固守那些所致」。<sup>84</sup>

<sup>81</sup>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的真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台北：全華科技圖書公司，2004年），頁5。

<sup>82</sup>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魔鳥」，頁92-93。

<sup>83</sup>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頁284。

<sup>84</sup> 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頁334-335。以下同。

顯然地，佐藤理想中的文明觀，雖非當時執政者口口聲聲大言不慚的「文明開化」那種文明觀，而是立基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彼此的經濟發達後，始能達到其所謂人道主義式「友愛」的文明境界，然而囿於現實環境，在他取材自台灣的這些作品中，雖可見到他對被殖民者立場的理解，卻也只能採取一種冷靜客觀的凝視態度，<sup>85</sup>甚至將此種新文明的實現訴諸於「未來式」，認為應以人類生命的基礎來做考慮，亦即「並非 1 年 2 年，而是須要等待 1 個世紀，2 個世紀以上的。這種耐性是必要的吧」，從如此的觀點來看，正如同林獻堂所一語道破的，佐藤訴求處於痛苦萬分狀態的被殖民者能有多一些的「耐性」，在現實上是根本忽略了屬於被殖民者的台灣住民所殷切期盼能立即改變現狀之「焦慮感」，尤其是對身為知識分子的林氏而言，此種焦慮感更屬於一種希望重拾，甚至復興己身文明、文化上的焦慮感。而此種焦慮感的解消，不僅林氏清楚，佐藤也並非不明白，那就是只有在消滅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模式下才能完成，只是在日本軍國主義、獨裁主義氣焰日益隆盛之際，這份「遠景」終究只能成為海市蜃樓。佐藤非但無能為力改變現狀，就連他與林氏坦然交心的這段談話，於其《霧社》一書於 1943 年再版時，亦因敏感的政治情勢，以及日本官憲雷厲風行的書報檢查，而無法收錄其中。

## 二、西川滿的「台灣論」

倘若細數日據時期在台最備受爭議的日本文學家，莫過於西川滿了。西川於 1908 年生於會津若松的武士家庭，3 歲隨父來台，並在台北完成高校教育後，返日就讀早稻田大學法文系，5 年後學成返台，任職於《台灣日日新報》，開始了在台文學創作的生涯，其後更創立了《文藝台灣》雜誌，成為日本殖民帝國侵略體制與響應「皇民化」運動，最為配合的文藝刊物與輿論陣地，直至日本戰敗，西川被遣返日本為止，共計已在台灣居住了 36 年。而關於西川滿文學的評論，有論者認為，其文學不但在台灣文學研究領域中備受爭議，就連研究戰爭時期海外文學的日本學者，亦將其視為一個異例，而批判西川的最大爭議性，就在於認為西川及其作品帶有濃厚的殖民統治意識，尤其在中日戰爭期間之言行完全附和殖民者，且站在殖民者的利益，欺壓台灣作家，特別是指他建議殖民當局，為了「戰爭協力」的理由，關閉了由張文環所創刊的《台灣文學》雜誌。<sup>86</sup>在西川長

<sup>85</sup>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中村地平的台灣體驗：其作品與周邊」，頁 25。

<sup>86</sup> 彭瑞金，「地方主義文學」，<http://www.esouth.org/?q=tags/78>；以及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年），頁 60-61。



達 70 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發表了許多文學作品，其文學文本的一致特性，在於內容上全都以「台灣」作為主題，代表性著作包括〈赤崁記〉（1940 年）、〈採硫記〉（1942 年）、〈龍脈記〉（1942 年）及《台灣縱貫鐵道》（1944 年）等長、短篇小說。在西川眾多描寫台灣為主題的作品中，如同時任台北帝國大學教授，同時也是詩人的矢野峰人之評論：「就是透過強烈的南國情懷、異國風情——不，不如說是透過這些台灣風景——所描繪出來的想像世界。……西川君的想像就是這樣天馬行空，來往自如，直到絢爛的樓閣已然成形，才肯收起他的羽翼」，<sup>87</sup>而這種充滿了想像的世界，自然無法貼近台灣民眾的現實生活，<sup>88</sup>甚至讓西川得以藉由這些虛構、想像中重構了台灣歷史，為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建立一套新的系譜，<sup>89</sup>同時，也從中聯結起與日本殖民帝國的萬縷千絲，並希冀產生台、日之間新的「想像的共同體」意識。

西川的〈赤崁記〉、〈採硫記〉、〈龍脈記〉，在內容上大多取材自中國明、清時代的歷史小說，包括了描寫鄭成功家族在台悲劇、郁永河來台開採硫磺、劉銘傳建設台灣鐵路等傳奇故事，而這些故事在西川帶有特殊殖民者「感性」的筆觸下，自然又呈現了不同的態樣。此外，在以〈龍脈記〉為基礎發展，所撰寫的重要性、代表性兼具之長篇小說《台灣縱貫鐵道》中，西川描寫了甲午戰後被迫割讓予日本的台灣，從「領台」的日本軍艦抵達基隆外海，與各地蜂擁而至的抗日義軍交戰，至日軍最高指揮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病逝」台南為止 5 個月之間的「耽美故事」，也展現了殖民者的觀點與視野。在這個構思的「故事」起始，西川即透過故事主人翁之一的鐵路技師「小山保政」所僱用的台灣嚮導「顧振泉」之口，藉其眼見的「神諭」，且是台灣傳統民間信仰中最普遍、最受愛戴，以及信眾最多的神祇——土地公（福德正神）的「神諭」，早已得到「天命難違」般的完美結局：「日本軍必勝，有這樣的神諭。那獅球嶺有一座土地公廟。上回，西仔（法蘭西）攻來時，土地公與媽祖用手杖趕走他們。但這次在戰爭開始之前，土地公的神木裂成二」，<sup>90</sup>而對抗日義軍清剿必勝的「天命」，甚至無可免俗地擴展到了日本殖民帝國的「文明事業」、「黃種人之負擔」說，即如同小說中首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水野遵所說：「日本接受了清國的割讓台灣，是把這土地與人

<sup>87</sup>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二大日本語雜誌的誕生」，《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 年），頁 21-22；此外，西川本人也自述幼年時期，在台北大稻埕生活，初次感到強烈的 *exotisme*，是在祭典看見遊街闊步而行的范、謝將軍容姿之時，這些影像也令西川終身揮之不去，參見西川滿著，陳千武譯，《西川滿小說集 2》（高雄：春暉出版社，1997 年），頁 2。

<sup>88</sup> 葉石濤，「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頁 61。

<sup>89</sup> 王德威選編，「華麗島的誘惑與失落」，《台灣：從文學看歷史》（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5 年），頁 188。

<sup>90</sup>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台灣縱貫鐵道》（台北：柏室科技藝術公司，2005 年），頁 58。

民都接受，把人民生生育化，使這塊土地名副其實成為皇土，我覺得這便是我們的使命……漸漸的使這島上的人成為忠良的帝國臣民，我認為這樣才是真正的政治」。<sup>91</sup>同時，在殖民者自視為「天命」、「正統」的凝視及筆觸下，台灣抗日義軍江國輝、吳得福、吳湯興、姜紹祖、徐驤等人，均被化身為執迷不悟、毫無道義、為反抗而反抗的「匪賊」，那不戰而降的大料崁（桃園一帶）守將余清勝，以及幾位積極協助日軍的台灣嚮導，倒是成為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只是，在西川透由書中從軍記者「村上正名」之口，感嘆：「作戰斃還好，空虛的因病待死，才悲慘」之時，<sup>92</sup>在八卦山攻防戰之役遭義軍擊斃之日曾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第2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師團參謀緒方中佐等重要將領，<sup>93</sup>甚至是北白川宮的愛馬「宮城野」，在總督府避免激勵抗日義軍的政治考量下，所反映在西川小說或其他日本史書中，都無法成為因作戰陣亡的真勇者，反倒是一個個成為了因為台灣風土病——瘧疾等各種疫病死亡的悲慘性人物。

當然，前述西川的最大爭議處，仍於其在中日戰爭期間的言行完全附和殖民者，並權充當局推動「皇民化」運動的旗手，尤其在1943年11月13日所舉行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中，「台灣文學奉公會」會長山本致詞時表示：「今日的文學不像過去那樣是文學者個人感情的反芻。必須回應國家至上的命令來從事創造的活動。……台灣必須依循絕對強韌且純粹無雜的日本精神來產生新的皇民文學。藉著文學的力量來鼓舞激勵邁向兵道的本島青年。以文學為武器，宣揚在大東亞戰爭中要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的必勝信念，這才是諸君責無旁貸的任務」，而西川為驅策文學工作者，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搖旗吶喊時，主導通過了「獻上文藝雜誌」，納入「戰鬥配置」之建議，針對日本御用學者對台灣作家提出之質疑大肆攻訐、恐嚇下，張文環甚至曾一度在會議中沈痛地辯解：「台灣沒有非皇民文學。假如有任何人寫出非皇民文學，一律槍殺」之語。<sup>94</sup>於是台灣文藝雜誌在決戰文學的「一致行動」下，無論是西川滿的《文藝台灣》或張文環的《台灣文學》，均不得不自行廢刊，而一體改為「台灣文學奉公會」的

<sup>91</sup>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124、348。

<sup>92</sup> 西川滿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343。

<sup>93</sup> 關於日曾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山根信成少將等人之死因，中日兩國有關記載有所不同，日本方面多依《台灣總督府公報》、《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等官方文書，統一指稱渠等係死於瘧疾，尤其直指北白川宮係於10月28日「病歿」於台南；而台灣方面記載則多為「戰歿」，惟真正死處不一而足，在新竹、彰化八卦山、虎尾或嘉義等地遭抗日義軍襲殺而亡的說法皆有之，參見鍾肇政，「台灣鄉土史的開拓者——序黃榮洛著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http://www.taiwanus.net/history/4/6.htm>。

<sup>94</sup> 「台灣決戰文學會議」，*文藝台灣*，第7卷第2號（1944年1月），頁35。

機關雜誌了。<sup>95</sup>至此，台灣文學已完全被納入「皇民化」運動「決戰」時期的體制，台灣作家也頓失一個真正為苦難的台灣住民「發聲」之輿論陣地。

### 三、濱田隼雄的「台灣論」

濱田隼雄於 1909 年生於宮城縣仙台市，其先祖皆為伊達藩的高級武士。濱田曾來台就讀台北高等學校，後返日進入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時值日本普羅文學興盛時期，其思想逐漸左傾，廣泛研究馬克思主義，以及結交社會主義者。大學畢業後，先是擔任東京《實業時代》雜誌記者，撰寫有關經濟問題方面的評論，因對社會失望，為改變生活，返回台灣先後任教台北靜修女學校、台南第一高等女學校、台北第一高等女學校等，而關於在台文學的創作，肇始於結識時任「台灣日日新報」學藝部的西川滿，陸續在《文藝台灣》發表了《南方移民村》（1942 年）、《草創》（1944 年）、《本島農人傳》（1944 年）、《南山開闢》等長短篇小說，且如同西川滿一樣，直至日本戰敗才被遣返日本，在台灣居住了 14 年之久。

濱田為後人評論為寫實主義的作家，其早期作品皆以台灣為背景，代表著作即是《南方移民村》。該書描述的是日本東北地方一群沒有土地的窮苦農民，移民到台灣東部日本私人製糖會社的移民村，在惡劣荒蕪的土地上進行甘蔗栽種工作，以及紮根台灣的艱辛情況，但全書的架構，在現今看來卻是相當奇特的，因為其與世界被殖民地普遍的情境格格不入，亦即錯放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相對優劣的「位置」。首先濱田鋪陳於故事啓始，即透過見習醫師出身、醫術精湛及富有臨床經驗，因而順利考取醫師執照的故事主人翁「神野珪介」之口，對於其在彰化市街行醫及致力台灣風土病——瘧疾的醫治，卻遭雖具醫專學歷但醫術普通的 2 位本島人醫師策動之排擠與攻訐情況感到落寞，認為：「他並沒有以內地人而有優越感，一點也沒有以高高在上的態度來對待本島人同業的醫生，因為他做不到，不管對方身為醫生是不認真或醫術不好，…作夢野沒想到要加以批評或排斥，而是因為他們是在地人的醫生，內心裡有一種想為他們辯護、鼓勵……」。<sup>96</sup>

<sup>95</sup> 參見龍瑛宗，「文藝台灣與台灣文藝」，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essay/essay\\_a06.htm](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essay/essay_a06.htm)；以及莊永明，〈「台灣決戰文學會議」舉行討論〉，

<http://www.rti.com.tw/Taiwan/TaiwanHistory.aspx?id=119&Month=11>。

<sup>96</sup> 濱田隼雄著，黃玉燕譯，*南方移民村*（台北：柏室科技藝術公司，2004 年），頁 20。

「神野」被迫離開彰化，前往東部日資「台東製糖株式會社」所經營的「鹿田移民村」之時，對於眼見內地農民因會社的殖產作法不夠親切、指導生產的專員不夠熱心、向會社的貸款持續增加，以及無法成為自耕農的預見等怨嘆，所呈現許多移民因貧苦落魄而陸續選擇離村返日，或因負債無力償還繼續留在原地過著沒有明天般的生活等態樣簡直不敢相信：「他（神野）的腦海裡所浮現出來的也是比本島人的農民更不錯的樣子，而他眼前所目睹的，在內地來說也是極貧農似的，落魄的樣子」。<sup>97</sup>然而，此地內地農民生活淒慘的原因，從書中內容顯示，濱田除了歸咎於東台灣風災水害、風土病、病蟲害等特有影響外，並認為是移民村附近蕃社因受到官方的保護優厚、取得了比移民村較好的土地耕種，以及設置了現代化農耕設備所致，<sup>98</sup>此種總督府「捨殖民主、就被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原因，或殖民者產生「內地人可憐」、「本島人幸福」的感覺，也看來顯得有些匪夷所思。<sup>99</sup>倘若對照金澤吉次郎針對當時日本在台灣從事的官營、私營移民事業所作官樣分析之結論：「部分移民留在移民村裡繼續奮鬥，在政府的補助與保護之下情況漸漸好轉，已趨穩定」，<sup>100</sup>濱田的小說對於移民者的處境，有著更加灰色、游移且複雜的結論，那就是只能配合當時日本帝國的國策，再次向更加遙遠的南方——馬來西亞、菲律賓、蘇門達臘等地移村，一切重新開始，一如當年因沒有土地，從翻不了身的內地，不得已選擇來台構築一個朦朧，也許是虛幻的，但似乎又能夠憧憬地尋求的「美夢」。只是無論金澤或濱田，在軍國主義橫行的年代，都未能勇敢指出，內地農業移民的真正悲劇原因，除殖民政策因進入「戰時體制」搖擺不定外，更存在日本本國官僚、財閥對無產者壓迫剝削「內在殖民」的嚴重問題。

而相較於希望生根定居於台灣這塊土地的內地農業移民，濱田描繪了其他「內地人」醜陋的過客心態：「有許多內地人來台灣，但他們大都是公務員或公司職員的月薪族，他們有許許多多的人目的是想早日得到撫恤金就回日本。沒有人想埋骨這台灣。扎根於土地的是本島人。內地人像寄生蟲一樣」，他繼續比較兩種「內地人」的不同：「沒有土地一籌莫展的內地農民，不得不到外地來，因

<sup>97</sup> 濱田隼雄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30。

<sup>98</sup> 濱田隼雄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268-269。

<sup>99</sup> 《台灣民報》社論對此曾有相反的報導，它論及東台灣花蓮港廳下官有林野，一切盡賣給鹽水港製糖會社；台東廳則賣給台東製糖會社，除此之外，不再許其他住民染一指，凡屬利權方面，可說是完全落在兩社掌中，人民不過做會社的農奴而已，換言之，就是以台灣人為犧牲，來飽內地人私腹的。參見「絕對不採取經濟榨取的方針」，**台灣民報**，第 3 卷第 7 號（大正 14 年 3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90。

<sup>100</sup> 金澤吉次郎，「台灣に於ける移植民事業の展望」，**台灣時報**，1937 年 3 月至 5 月。

此來台灣。……在這一點上移民不同。他們不只進入本島人中，一樣的在這個島上的大地下根，他們還把尚未開拓之地順利開墾了，真的不能不把這土地成為屬於自己的」。<sup>101</sup>對此，《台灣民報》社論也批評「日本人雖有 18 萬，這都不是有永住台灣之心，十之八九是想得了利發了財就要回到本國去安樂享福的。既不以台灣做老後安身之地，也自不願為子孫永住之鄉」，<sup>102</sup>顯然地，官吏或月薪族職員的「內地人」之所以來台，當然是衝著比留在本國更能獲得優渥金錢或物質報酬的殖民「利益」而來，而在台灣官吏除有加俸、官舍的特別待遇外，退職亦有賜金及賜土地的三重優遇現象，可以說真的是「萬般皆下品，唯有官吏好」。<sup>103</sup>同樣地，內地的農業移民，難道不也是為了可能實現成為「三甲五分土地」的自耕農「利益」，而遠渡重洋來到南方殖民地的台灣嗎？顯見，殖民者對於殖民利益的攫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此外，對於殖民者之中，是否也曾對發生在殖民地的剝削實境有所懺悔之處，濱田則是留有伏筆，那就是故事主人翁之一的會社新指導員「國分」，在一趟內地之旅，發現內地亦如本島有著赤貧、落魄及潦倒的無產者之後，對於日本在殖民地一向灌輸「內地＝優越」的錯誤教育有了初步的體認，進而思索更深層次「人的價值」的決定因素，那就是「教育（意識形態）≠實踐」，「人的價值」不能任由後天的意識形態灌輸，而是應該回到群眾之中，藉由生活實踐的鍛鍊來決定，<sup>104</sup>只是「國分」的體認、思索僅進行到一半，他只期許自己經由這樣的鍛鍊來瞭解真正的自己、自己存在的價值，至多僅止於內地農民的「人的價值」，然而，廣大的被殖民者的「人的價值」，並不在他所要、所能體認、思索的範圍之內。

綜上所述，濱田的《南方移民村》雖以台灣為背景，描述的卻仍是以「殖民者」——儘管在「內在殖民」情境下是另類的「被殖民者」——為主體的故事，全書幾乎欠缺包括佔人口優勢的「本島人」與「蕃人」在內的「被殖民者」在場，匆匆一瞥的印象，也多是引起內地農民羨慕的「幸福的本島人」。對此，濱田本人在曾論及寫作本書的心路歷程時亦印證了此點：「日本移民們在台灣大地扎根，胼手胝足，艱苦建設家園，其中辛酸不足為外人道。我要把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獻給你們。你們努力生存的姿態，正是日本人向南方發展的可貴歷史中，一

<sup>101</sup> 濱田隼雄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76-77。

<sup>102</sup> 「在台灣日本人的誤國心：忠言本是逆耳的」，*台灣民報*，第 111 號（大正 15 年 6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335。

<sup>103</sup> 「對於台灣的退官者還有特別優遇的必要嗎」，*台灣民報*，第 3 卷第 5 號（大正 14 年 2 月），吳密察、吳瑞雲編譯，前引書，頁 182。

<sup>104</sup> 濱田隼雄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155-156。

段美好的插曲」，<sup>105</sup>尤其故事結尾部分謳歌「大東亞戰爭」、「東亞共榮圈」所帶來光明的希望、精神的充實，以及移村「向南方發展的新道路開了」等等，使文學的作品，終究仍無法避免地為日本帝國南進「國策」的政治服務，本書的不斷地獲得總督府的獎賞與推薦，也是不難想見的。

#### 四、庄司總一的「台灣論」

庄司總一於 1906 年生於山形縣酒田市，成長期間幾度隨著身為醫生的父親渡海來台，先後畢業於台南港町小學、台南一中，後返日就讀應慶義塾大學英文科畢業，可說是與台灣的淵源深厚。庄司的文學創作，始於就讀應慶大學的時代，陸續發表了《夜景》、《陳夫人》（1940、1942 年）、《南方的樹枝》（1943 年）、《土與光》等長短篇小說，其中《陳夫人》第 1 部（夫婦）及第 2 部（親子），除為庄司贏得了尊貴獎賞與極高聲望外，亦如同濱田的《南方移民村》般，被台灣總督府情報部選定為推薦圖書，換言之，即在政治上被利用為從旁支持台灣的「皇民化」運動的文學作品。<sup>106</sup>

儘管庄司表明《陳夫人》的主題是在於探究「人與人」，特別是不同血統、傳統與條件的人們要如何、到何種程度，達成愛、理解與融合這種人性的振幅和可能性，<sup>107</sup>然而，以描述日本內地傳統女性「安子」，與在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受過高等教育的故事主人翁本島望族「陳清文」結婚為起點的小說內容，處理了當時殖民者所極力鼓吹「皇民化」政策的最高理想——「內台融合」的問題，而這種形式平等，實質卻不平等的「融合」，其結果是「衝突」、「不幸」的開始，終究衍生出種種複雜、難解的民族矛盾與認同問題，而造成台灣人認同錯亂的最大泉源。這樣的民族矛盾，在殖民地台灣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是無所不在，又如影隨行，例如儘管「陳清文」比起普通日本人具有更高深的教養與學問，但因為只是本島的「日本人」，甚至仍被視為「台灣人」，就遭遇諸多不平等的對待，包括：與「安子」的婚事受到女方親友多重阻擾；成績差得多的同班日本同學，卻成為職場上的頂頭上司；不管如何努力，但像是阻隔著無法超越的障礙，幾乎無法被任用為高級官吏；參加文化協會某個文化團體的心靈活動及其實際運動，被

<sup>105</sup> 文藝台灣，第 3 卷第 1 號，1941 年 10 月，序言。

<sup>106</sup> 河原功，「陳夫人：認識台灣的鉅著」，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嫁台灣郎的日本女子（原名：陳夫人）（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 年），頁 11。

<sup>107</sup> 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再版有感」，前引書，頁 486。

認定有不軌意圖，而遭到檢舉逮捕；甚至只因偶爾身著「台灣服」到日本基督教會，就遭到日人的歧視而被逐出等等，這些對待都反覆使得他原有「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台灣人」、「對於自己出生成長的家，反倒看來有點異國的风情」的個人自覺遭到質疑與動搖，終究他明白日本殖民主的一切口號、理論、思想或倫理，「都比不過民族的血球所具有的微妙的決定性」，<sup>108</sup>在「內地日本人」殖民思維的凝視下，「本島日本人」的稱謂，不過只是「被殖民者」的另一個「潛台詞」(subtext)罷了。

故事中最悲慘之事，莫過於這份被殖民者的煩惱與苦悶心理，毫不保留地傳承給下一代——女兒「陳清子」身上。「陳清子」這個名字，如同其血統一樣，有個「混血」或「雜交」——中國(台灣)的姓，日本的名——的屬性，由於有了中國的姓，導致同學們不叫她「清子桑」而叫「陳桑」，但面對這樣既複雜又混淆的矛盾自卑角色，「清子」卻能輕易將它一語道破：「想自己連灣生(按：在台灣出生的內地日本人)都不是，我既是日本人又是台灣人，這等於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台灣人。這兩者像拙於調和的水彩顏料一樣，總是無法調配出清爽的好顏色」。<sup>109</sup>因為「民族的血球」的不同，在日本殖民體制之下，即便殖民者殖民台灣，推動「同化」甚至「皇民化」運動業已邁入第4個10年，「內台融合」的目標終究只能淪為口號，換言之，橫互在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同化」或「皇民化」運動，雖未達到一觸即發的「敵我矛盾」，但也實質上存在著愈來愈多的「內部矛盾」問題。在這裡，作為殖民主體的「我」或「我們」，並不及於作為被殖民客體的「我」或「我們」，也就是「日本人」絕對不等於「台灣人」，即便以民族融合最有效的動力——通婚，也無法改變這鐵一般的事實，甚至這婚姻平常雖和諧無事，但也可能因為瑣屑之事而破裂，以致於「清子」寧願父親「清文」是內地人，或者母親「安子」是本島人。而故事中儘管「安子」同樣深受其日本同胞給予的這些不平對待之苦，也曾滔滔不絕地向「清文」辯論「你是本島人，我是內地人，這跟我們真正的生命豈不是沒有什麼關係嗎？」，但在她的潛意識裡，仍然存在「無法抗拒的身上所流血的命令」，因而阻擾了「清文」三弟「瑞文」之子「陳明」對其女兒的愛戀，因為「清子」若與身為「本島人」的「明」結婚，則「她身上所流的日本人性質的血越發稀薄了」<sup>110</sup>此外，故事的另一角落，存在著另一個殖民體制常見的核心問題，即民族認同的問題，例如，隨著中日戰爭的逐漸發展成為可能之時，在台北就讀的「明」就不斷遭到日人嗤笑侮蔑地質

<sup>108</sup> 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再版有感」，前引書，頁34、39、182。

<sup>109</sup> 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421-422。

<sup>110</sup> 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460-461。

疑：「如果日本和中國發生戰爭，你要靠哪一邊？」<sup>111</sup>此種被迫「選邊」的壓力，或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思維，在戰爭末期「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實際對話，或台、日作家的文學文本中，更是隨處可見。對於上述這些不幸問題的解決，庄司似乎只有透過「清文」、「安子」之口，訴諸於更高遠、虛無的精神層次，例如「清文」在回顧過去、反省自我之時曾說：「台灣人都太過於追求幸福。只追求幸福，這不過是人的墮落。如果台灣人人知道人根本的生存之道不在於幸福而是在於義務，顯然便會產生更美好更崇高的精神。而我們缺乏這種觀念，只是急於求得。我們要思考應如何多多付出」；以及「安子」在心裡小聲地提醒女兒「清子」一種重要東西——「愛」，<sup>112</sup>都顯示了庄司認為只要殖民體制不變，這些問題都將無法順利解決，而「盡義務」與「闡揚愛」的精神，才是作者、身為故事主角的「清文」、「安子」，甚至是現實生活的廣大被殖民者，現階段都有能力，也僅能做到之事，<sup>113</sup>然而，只是僅憑如此，那距離真正的救贖之道仍然相當遙不可及。

綜上所述，庄司揭露了殖民地台灣的「黑暗面」，把台灣人在殖民體制下的精神錯亂與感受，如實地描繪出來，然而問題的核心，亦如同台灣知識分子王育林閱讀本書後直指「沒有任何解決妙策」的感想一樣，<sup>114</sup>最後只能淪於務虛的空言。此外，本書也因為觸及的問題尖銳、敏感，因而同被日本人批判為具有暴露性的描寫，認為：「將近半世紀的台灣政治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好不容易才把台灣培養到現在這樣，而你卻要把我們的缺失揭發出來，這樣就使我們太不爽了」。<sup>115</sup>儘管如此，庄司的殖民寫作風格，仍能嚴守與秉持「只要本島人在台灣佔人口的絕對多數，大部分的問題就必須以本島人為對象。特別是對台灣值得提起的問題，若不以本島人為對象，這些問題便沒有提起的價值」的精神，<sup>116</sup>相較於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欠缺本島人的在場而言，更增添了幾分人道主義者的良知。

## 第四節 小結

<sup>111</sup> 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441。

<sup>112</sup> 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282、482。

<sup>113</sup> 尾崎秀樹，「庄司總一的陳夫人」，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8。

<sup>114</sup> 庄司總一，「再版有感」，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485。

<sup>115</sup> 庄司總一，「再版有感」，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484。

<sup>116</sup> 陳藻香，「讀庄司總一的陳夫人」，庄司總一著，黃玉燕譯，前引書，頁 16。



本章就本文撰寫的資源與能力所及，檢視了從日本明治時期至昭和時期以來，歷任的台灣總督、重要且相關的啓蒙家、殖民政策學者，以及文學、小說家等各類知識分子的視野中，拼湊出對「他者」台灣的想像與認知圖景。初步而言，這些知識分子所拼湊出「他者」台灣的圖景仍有差異之處，從渠等所公布的各類官方文件、訓詞，以及所書寫的各類文本、小說來看，此等圖景所產生的根源與差異造成的因素，可能包括：**「文明開化」的判準、傳統思維的羈絆、時代潮流的演進、軍國主義的對決等。**

那麼，分析這些圖景所產生的根源，以及差異造成的因素後，整體而言，這些知識分子所呈現「他者」台灣的圖景輪廓為何呢？首先即是，**「異國情趣」的營造**；其次是，**殖民能力的誇耀**；第三是，**自治不足的認定**；第四是，**「同化 / 皇民化」政策的擇定**；第五是，**「民族」認同的質疑等**。同時，也因為產生如此「誤讀」的圖景輪廓，因此台灣住民雖然在接受「更文明」、「更先進」、「更人道」的殖民者長達 51 餘年之直接教化、感召下，依然仍是殖民主體凝視中永遠的「他者」。而關於上述的初步分析，本文將在第五章作進一步探討。